

中山文化
社會科學叢書
教育館

簡貫三編著

工業化與社會建設

簡貫三



中華書局印行

法

ECNULIB



10009813185054

簡貫三編著

工業化

與
社會
建設

中華書局印行

自序

余少年居於中原之遠鄉鄙野，目睹農村社會生活之固陋拮据，私衷怒然，莫知所由。及長，游學四方，見聞較廣，乃知此類生活型態，並非限於中原地帶，凡中國距海較遠之人民，莫不如此。嗣後對於社會學科，有志研究，並在各大學忝任教授，與師生探討中國社會所以致此之微結以及改革之方略。有以文化學說作社會形態之定性分析者；有以社會事業為挽救沈疴之特效藥劑者；其他如優生理論，政治觀點，亦各持之有故，冀成爲一家之言。但余以爲文化分析近於形式，似不易解決社會核心問題，社會事業偏於消極，何能普渡衆生，惟有羣策羣力，促成工業化之建設，以科學精神爲本，以新式技術爲用，方可脫離貧弱，邁進富強，躋於現代化之林。心懷此意，久而彌堅，會前歲轉任立法工作，用特於審議社會立法經濟立法之餘，不揣疏淺，編著斯書，略抒已往之蘊結，就正於賢達之前。余原有「理論社會學」之出版，茲復刊印新作，希由「理論」而進於「實用」，爲中國社會前途，致期望雲霓之意。歐風美雨，已在目前，何去何從，幸讀者有以教之。

工業化與社會建設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工業化的意義

- 第一節 工業化・工業建設・工業革命……………一
工業革命的起源意義及影響 工業革命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之演變 工業革命工業建設與工業化的關係及區別 工業化所涵育的社會風尚與生活態度。
- 第二節 各國的工業革命……………五
工業革命的急湍淘汰了不少民族富強了許多國家 由英德美蘇聯日本工業革命的史蹟可以抉擇中國工業建設的前途
- 第三節 中國的工業革命……………一一
中國工業革命的發動及失敗 實業計劃與工業革命 國父指示中國工業革命之方針——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使工業建設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
- 第四節 技術觀念與工業化……………一五
技術的起源與進化 所謂技術時代與技術政治 農業社會的技術觀念 技術革命的必然性 現代技術觀念所涵育的社會意識與工作方式

第一章 工業化的必要

第五節 由三種社會生活的比較論中國工業革命……………二一

殘餘的游牧生活濃厚的農業生活微溫的工業生活形成中國經濟上不平衡的發展 農業社會是封鎖的停滯的貧乏的工業社會是進步的廣大的豐富的 工業建設成功以後可以解決人口問題

第六節 由社會改造論中國工業化……………二四

現代化的主要標誌：德謨克拉西與賽因斯 中國將來的出路就是由工業化到現代化 工業化對於社會組織的擴大政治風氣的革新都有相當的影響

第七節 中國戰前戰時的社會變動與工業建設……………二八

秦漢以來中國社會停滯的原因 近代中國社會的劇變 中國經濟之難境 戰時社會的變動與工業建設 第八節 戰後世界與中國工業建設……………三三

社會進化論者與現實主義者的戰後世界觀 戰後的世界有三種可能性：和平苟安與戰爭 中國的工業建設 設如果在戰後短期間迅速完成處變固然無所畏懼處常亦可以有所貢獻於世界

第二章 中國工業化的困難

第九節 工業化進程中思想上之震盪……………三八

觀念主義者稱道貧而能樂窮而能守的精神 復古主義者懷念農業社會與欣賞山林文化的意識 一部分西洋人士唯恐中國工業化完成以後有變為帝國主義威脅世界和平之可能

第十節 由地主商人產業家論中國工業建設之困境……………四二

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常是三位一體 土地資本轉化為商業資本商業資本又轉化為土地資本中國在這循環中不易完成工業上的革命 現代中國的產業家往往仍徘徊於地主與商人之間

第十一節 由企業精神論中國工業建設之難境 四六

西洋企業精神之特質與起源 企業精神在中國難產之原因 將來企業精神之轉化

第四章 中國工業化的條件及途徑

第十二節 工業建設的先決條件 五〇

中國工業建設的先決條件 國際間的和平局面 國內的統一安定 民主政治的實施 蘇聯自一九二八年為推行五年工業計劃即採取多邊的和平外交政策 國內如不統一安定則工業建設絕難得到國外的援助

英法美等國都是先實施民主政治而後才有工業革命的成功 中國如實行民主政治即可消除歐美人士疑慮 中國工業建設成功後有威脅世界和平之可能

第十三節 工業化途徑的論爭 五六

工業農業發展的先後問題 工業農業的比重問題 重工業輕工業發展的先後問題 致富圖強的輕重先後問題 思想體系的方向問題

第十四節 泛論工業化的途徑 六〇

推行計劃經濟與注重科學研究 須於戰後十年二十年之內將重工業建設成功 以戰敗國的機器代替賠款 大量借用外國資本與人材

第十五節 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問題 六四

大的組織與新的技術之關係 託拉斯加特爾康米倫的性質 現在中國工業組織的成分 大規模的工業組

織與民生主義 民營工業儘可積極發展的理由

第十六節 中國工業建設的分區問題……………七一

戰後工業建設採取分區集中制的四大理由 分區集中制的目標在使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 戰後中國究應分爲幾大工業區——三區的七區的九區的十一區的十二區的 分區集中制並非各區自足自給而是造成有機的統一體

第十七節 中國工業建設中的土地問題……………七八

工業建設既須生產的社會亦須消費的社會 土地問題之解決對於工業的生產與消費兩有裨益 平均地權 應在節制資本之先 現在中國的地主對於農業的態度是最落伍的尙不及十八九世紀的歐洲 土地的所有權經過了調整許多農民才可採用大農制及新式農具 許多農民經過土地所有權的調整及新式技術的採用以後收穫比以前豐富這不但工業的生產與消費隨之提高即政府的收入亦將爲之增加

第五章 工業建設與計劃社會

第十八節 社會計劃……………八四

社會計劃與計劃社會之區別 由原始游牧農業時代所見的社會計劃之潛能

第十九節 計劃社會……………八六

柏拉圖謨爾傅里葉等所理想的計劃社會 僅有社會理想而無科學技術絕難建立計劃社會

第二十節 計劃社會的中心問題——計劃經濟……………八九

個人主義的興起及轉變 從自由經濟到管制經濟從管制經濟到計劃經濟的理由

第二十一節 計劃經濟的類型……………九五

微溫的計劃經濟與跛行的計劃經濟 景氣型的計劃經濟與國防型的計劃經濟 先進國的計劃經濟與落後國的計劃經濟

第二十二節 計劃經濟運行之法則……………九九

主觀與客觀的適應理論與實踐的合一 三大客觀條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與社會結構 設計的四大程序

第二十三節 民生主義的社會建設……………一〇三—一〇六

民生主義比資本主義完善比社會主義切實比共產主義經濟 民生主義以計劃經濟代替無政府主義的經濟
民生主義以生產分配的平行主義代替生產的單軌主義 民生主義以共存共榮的全體主義代替自私自利的
個人主義 民生主義以和平方式代替強暴方式

工業化與社會建設

第一章 工業化的意義

第一節 工業化·工業建設·工業革命

- 一、工業革命的起源意義及影響
- 二、工業革命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之演變
- 三、工業革命工業建設與工業化的關係及區別
- 四、工業化所涵育的社會風尚與生活態度

✓ 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這個術語，原于曼德 (Mantoux)，杜因比 (Arnold Toynbee)，吉達士 (Jevons) 的使用與研究，尤其是杜因比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出版「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講義」(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 以後，世人才開始領會這個革命的偉大意義並廣泛的應用這個術語。

✓ 工業革命有廣狹二義之不同。廣義的是泛指歷史上一切產業的劇烈變革而言；狹義的是專指十八九世紀機器工業的發明而言。機器工業的發生，許多人認為由于十八世紀末葉英國發明家瓦特 (Watt)；這些人。其實，這不過是事實推演的結果。在這以前，如手工業的進步，科學研究的興起，以及許多人士鬱蘊着衝決奔放的熱情，無不是促進機器工業發生的動力。柯爾 (Cole) 說過「我們往往有一種偏見，以為工業革命是一羣著名的科學家發明者經年累月探求的結果。固然這個人類的偉業天才演出了重要節節，可是社會的環境，歷史的大勢，如未有鋪好了發明之

路，那不管是怎樣的天才，仍是徒勞而無功的。——所以瓦特若生于不用鋼鐵的遠古時代，恐一定與草木同腐了。

機器發明以後，直接最受影響的，莫過于生產能力的大增。如以製針為例，一七七六年每人每天能製四、八〇〇枚，一八六七年能製六〇〇、〇〇〇枚，一九〇五年能製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枚，在一百三十年之間，一個人的雙手並沒有變化，而其生產能力，竟增加如此迅速，這都是機器進步的效果。機器的發明與進步，不但使人類的生產能力增加甚速，即連人類的家庭，鄉村，城市，國家，世界也引起了劇烈的變動。這些變動，在本書以後各節將要分別敘述。此處先引萊姆士的話，以說明其大體上的影響。他說：「一千七百八十五年當英人瓦特知道利用蒸汽作為動力時，近代資本主義的時代開始了。不久，其他的發明家繼續努力引起了各方面的迅速變革，于是新的時代從此開始，巨大的財富從此湧進，全世界的地方從此互相結合起來。」

總之，在歷史的洪流中，從沒有像工業革命影響人類這樣深遠的。它如春雷一鳴，全人類忽然為之驚醒；它如曙光在望，整個世界有了新的前途。

近代的工業革命，始于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的英國。繼而，法國于一八三〇年，美國于一八五〇年，俄國於一八六〇年，日德於一八七〇年急起直追，亦能於最短期間，迎頭趕上。

中國在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前，嚴守封建主義的壁壘，後來連次打了敗仗，才逐漸省悟非學習外國的新式工業與物質文化，絕不足以強國禦敵。所以中國的工業革命是外力的，而非自力的，是被動的，而非自動的。因為外來的嚴重打擊，才強迫走上工業革命的道路，這確是中國六十七年以來的實況。外來的打擊，嚴重極了，六十七年來的光陰，亦不算短了。然而自曾李的洋務技術運動起，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工業革命的大功，這便是我們國家積弱的所在，外寇日亟的間隙。日本、德國和中國差不多同時開始致力於工業革命（均在一八七〇年左右）可

是日德二國早已迎頭趕上，而我國呢，還是瞠乎其後，望塵莫及，及今思之，何等痛心。

近代人一提及工業革命，往往只聯想到一千七百七十年以後百年之間新興的「動力文明，機器技術，與工廠制度」。然而細細推敲起來，十八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只是人類全部產業革命歷史上燦爛的一頁，繼十八九世紀而起的工業革命，一定是日新月異，繼續無窮的。如近代二百四五十年之內，便有第一工業革命，第二工業革命，第三工業革命之分了。道布（Doob）在「資本主義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一書中，把一千七百年代中葉以後紡織工業上的發明稱為第一工業革命；把一千八百年代末葉鋼鐵工業的發明稱為第二工業革命。國父的見解是把機器的發明作為第一工業革命，把機器採用與統一國有統稱為第二工業革命，用意尤為深遠。

更有人把第一次大戰以後歐美風行的合理化運動，或煤油電氣的普遍應用，都稱為第三工業革命，無論是否正確，可以表示出來工業的進步何等迅速；我們如不奮力邁進，永遠不能趕上啊。此次世界大戰，技術上更為突飛猛進，所謂第四第五工業革命或不久就湧現於吾人之前；我們回顧過去，瞻望未來，直為我國滿懷憂惶之感。

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是這樣成長的：工業革命開其端，工業建設殿其後，終而照育光大，進到工業化的「化境」。換言之，工業革命對於舊的技術發生了相反的作用，工業建設對於新的技術貢獻了相成的作用——這樣的一反一成，才使物質與精神表裏貫通，養成了工業化的風尚。這三個步驟，固然有時可以合而為一，不必劃分，但是，工業化比工業革命工業建設更為艱巨，仍然是不可以等量齊觀的。因為破壞難而建設亦難，至於使社會樹立一種新的風尚，尤為不易，這是各時代都是如此的。

近來在論壇上，往往把這三個術語——工業革命，工業建設，工業化——混為一談，在通常的意義方面，大體上可以如此通用；但在嚴格的意義方面，就應釐然劃分，以指明其廣狹輕重之不同。中國在清末所發動的仿效西洋

技術的洋務運動，可以算是有工業革命的意義，今後急起直追，不僅要開拓工業建設的局面，而且要深入工業化的遠景。以中國農業社會氣息之深重，國民文盲之衆多，以及其他國內國外條件之牽制，希圖工業建設之成功，本已困難重重；至於更高一層的工業化，恐非短時間所能完成了。

谷春帆先生歸納工業化的意義爲「勇猛精進」的精神，顧毓琮先生分析工業化的心理建設爲下列八項，說明了工業化的意境與社會風尚，人生態度，都有密切的聯繫：

- 一、以人定勝天代替聽天由命
- 二、以精益求精代替抱殘守缺
- 三、以進步中求安定代替安定中求進步
- 四、以組織配合的整體代替散漫零星的各體
- 五、以準確的代替差不多
- 六、以標準代替粗濫
- 七、以效率代替浪費
- 八、以造產建國代替將本求利

我以為工業化的內容，不但要建築大規模的工廠，製造形形色色的物品，而且要更進一步的運用科學技術的原理，改造我們的社會組織，更新我們的生活態度。

我們看每一架機器的結構，必須大小機械的相聯，各部門配合的適當，形成一個和諧的系統，才能夠動作起來發生效力。這種「緊湊合作和諧一致」的構狀，確足以啓示我們組織社會的道理。我們的社會，往往全體與部分，

部分與部分是衝突的，分裂的。有些部分在那裏工作，有些部分在那裏閒散；有些部分有熱有光，有些部分腐化生鏽，於是整個社會，還不如一架機器配合的緊湊和諧。我們所謂理想的社會，就是希望每一分子大而如一部動力，小而如一個螺絲，對於整個機器，都要發生適應的作用。過去農業社會，全體與部分是隔絕的，好像是一部半動不動的小機器。近代的工業社會，無論全體，無論部分，都關聯起來了；可是其中掣肘衝突之處，所在多有，遂使整個社會時常發生矛盾病態，好像一部失去調節作用的大機器。這兩種類型的社會，都不如一部好的機器那樣的緊湊和諧，所以我們的技術文明既不能順利的發展，以應人類之需求（如工業國家的資本家爲着保持私人利益，不願採用最新的技術並防止新的發明），又不能完全發揮效用，真正的使人類享受幸福（如利用新式技術發動侵略戰爭），近代的技術文明，還有「迅速」與「準確」的特點，頗足以啓示我們生活的態度。「迅速」乃表示效率性，「準確」乃表示精密性，這兩樣在農業社會是不大講究的，而在工業化的社會，却引爲公共生活的標準。

迅速的含意，還包含「積極性」，「樂觀性」；準確的含意，還包含「科學性」，「客觀性」。根據了這些含意，我們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都應滿懷着樂觀心情，積極向前；無論對於大小事情，都應以科學方法，求其客觀意義。在農業社會裏，因爲技術的低劣，那種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的心理，那種「差不多」「概然性」的觀念，自然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我們要想從農業社會進到工業社會，固然須從發展技術下手，可是同時從生活方面，提倡「迅速準確的習尚」，也是很必要的步驟。

第二節 各國的工業革命

一、工業革命的急湍淘汰了不少民族，富強了許多國家

二、由英法德美蘇聯日本工業革命的史蹟，可以抉擇中國工業建設的前途

人類的歷史若是浩浩蕩蕩的洪流，則工業革命必是其中的急湍。這種由機器及動力的發明所引起的技術革命，

先由英國這一個海島流出源泉，不久就波及法、德、美、俄、中、日等國，而匯為世界的高潮了。

近代英國最先改造的工業是紡織業。為什麼英國的紡織業，首先開了工業革命之門呢？這有它內在的與外在的原因。所謂內在的原因，第一、它的封建關係於十六世紀已經有所改革；第二、紡織工業較為進步，且又集中在斯塔福(Stafford)蘭開夏(Lancashire)數州，對於新技術的採行，容易接近。所謂外在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由印度輸入的棉織品比較精細，英國如不改良抵制，就受淘汰。這些原因合在一起，才引起紡織工業上的許多發明。

從一七三三年到一七三八年，約翰開(John Kay 1704—1764)發明飛梭(The flying shuttle)。一七六〇年，他的兒子羅柏斯特凱(Robert Kay)加以改良，製成爲上下自動的杼箱(The drop-box)。一七六八年，阿克賴特(Sir 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把水力裝備(The water frame)，應用到哈爾格利夫斯(Hargreaves)的 The spinning jenny 上面，便可紡出細細的棉紗來。後來，克羅姆普頓(Samuel Crompton 1733—1827)於一七七九年根據以上的機械原理，新創了一種機械，名爲 The mule，繼而幾經研究，改良爲自動的紡織機械，於是棉織工業比以前更爲進步了。

以上這些機械，多半適用在家庭方面。自從一七八二年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發明了世界聞名的蒸汽力，才使紡織工業由家庭移到工廠裏面。

從英國棉紡工業的初期看起來，可以曉得它是自動的，自發的，慢慢從「試驗與錯誤」中，以達到豁然開朗的境遇。

在這漫長的「試驗與錯誤」中，採鑛製鐵鍊鋼的發明，也隨着客觀的需要，風起雲湧，盛極一時。

由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六年，是英國製鐵鍊鋼發明後所引起的「鐵道狂」(railway mania)時期。這股狂氣，一直延續到一八七〇年，使英國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革命，大致完成。

這樣順着發明的程序，「由輕而重，由近及遠」，經歷了百年之久(約自一七三〇年至一八七〇年)，在當時的英國，是應該如此的。

「假若法國不發生革命，紡織工業的先進國，必非英國而是法國。」由諾拉斯(L. C. A. Knowles)這一句評語，可以看出來當時的英國情況，比起法蘭西有優越的地方。

及法國於一八二〇年漸趨安定，一八二五年，英國解禁機器出口之後，法國才於一八三〇年湧起產業革命的波瀾。雖說當時的法國，也有不少發明，可是大部分的機器依然源源不絕的由英運來。這種經濟的辦法，不但縮短了法國工業革命的時間，而且它的紡織工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也顯出奇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風姿。

德國的工業革命比英國落後了百年，比法國落後了四十年，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德國的封建關係，直到一八五〇年，才多方解除，以迎接這個新的機運。到了一八六〇或七〇年，這個機運醞釀成熟，便一擦而進工業革命的園地。德國的機械工業雖說發展甚遲，如坡奈所說「幾乎從一無所有的狀態裏建造出來的，」可是它一經發動，便傾流而下，一瀉千里，於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之間，迅速的成爲汪洋浩瀚。後來，不僅它的藥品工業，化學工業，冠絕世界，就是它的鐵路建設，也比法國迅速，它的煤鐵工業，也比英國增多了。

爲什麼它這樣的又快又好呢？因爲它能夠利用英法已有的技術特長，減少了許多錯誤的過程。尤其要緊的，它一經開始，便特別注意重工業之發展，看一看它的煤鐵增加之速，便可知其一斑：

德國煤產量增進表

一八六〇年	一六、三七〇、五〇〇噸	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平均	五四、四六〇、八〇〇噸
一八七〇年	三四、〇〇三、〇〇〇噸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平均	七四、九七〇、一〇〇噸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平均	三四、四八五、四〇〇噸	一九一〇年	一〇九、二九〇、〇〇〇噸
			一五二、八二七、八〇〇噸

德國鐵產量增進表

一八六〇年	一、四〇八、八〇〇噸	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平均	八、五五六、八〇〇噸
一八六六年	二、九九六、〇〇〇噸	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五年平均	一一、六七九、一〇〇噸
一八七一年	四、三六八、一〇〇噸	一九〇〇年	一八、九六四、一〇〇噸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平均	五、二六一、八〇〇噸	一九〇一年	二八、七〇九、七〇〇噸

德國這樣的疾馳突奔，居然於廿世紀初葉，取得了「後來居上」的地位，敢與英法美俄抗衡。

美國的工業革命，因為沒有英法德那樣的封建因素，進展尤為順利。波昂(Born)在其「美國的實驗」一書中有云：「美國工業發展之決定的原因，是在美國國民的「生活態度。」離開歐洲舊地方移到美國新地方的人數，在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二年之間，共達三千八百萬之多。他們離開過去習慣的生活態度之後，便在美國造成了一種合乎科學，合乎經濟的前進心理。」美國利用這些優越的條件，於一八五〇年左右，先發展東海岸數州的工業，後來向西推進（即有名的西進運動），普及全國。

美國當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這些不遠萬里而來，富於進取精神的男男女女，自然很起勁的開發本地的富源。單就這些富源中的鑛業來說，一八六〇年，不過九〇百萬美元，至一八八〇年即達二五〇百萬美元，至一九〇〇年又達一、〇〇〇百萬美元。

美國在鑛產中，特別注意煤油的生產，以發揮其工業上的特長。茲舉其生產增加的速度，以資證明：

年次	產出額（百萬桶）	年次	產出額（百萬桶）
一八七〇	五。三	一九〇〇	六三。六
一八八〇	二六。三	一九〇一	二〇九。六
一八九〇	四五。八	一九〇二	四四二。九
		一九〇九	一、〇〇七。三

美國如此發揮其工業上的特長，竟造成了一個「煤油時代」，壓倒了英國的「煤炭時代」。號稱為「世界工廠」的英國，掌握了世界霸權，達百年之久，到了這個時期，便顯出衰老蹣跚的樣子。

在帝俄時代，全國佈滿了封建勢力，所以它的工業革命，比英法德較難，比美國尤難。對於這種封建勢力，發生消腫作用，而又影響到工業革命的本身者，第一為農奴解放，第二為鐵道建設。

據米留可夫(Milikov)的統計，一七二七年，俄國農奴佔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五；一八三五年減到百分之四四·九三；一八五一年減到百分之三七·九〇；一八五九年，減到百分之三四·三九。農奴本為工業發展的堵牆，在這廿幾年當中，農奴既由百分之四十五，減少到百分之三四，無異乎給這一堵封建的牆壁洞開一扇自由的門戶。

農奴解放對於工業革命的影響，僅於自由勞動者的數量，稍有增加，此外並無什麼決定的意義。真正對於工業革命具有決定的意義者，莫過於鐵道建設。帝俄鐵道的建設，在一八六一年（工業革命初期）僅有一千四百八十八里，一八七六年增加到一萬七千六百廿里，一九〇〇年，全國的鐵道網大體完成，共有五萬六千一百三十里了。

此時「鐵道熱」的影響，確如小林良正所云，「對於當時帝俄的社會關係及經濟體制有除舊換新之力的。他說：『鐵道建設對於國民經濟是有革命的影響的。如鐵道修成以後，黑壤地帶的穀物中心地位便讓給南部一帶地方，凡在國民經濟以外的邊境地方，也隨之進入商品經濟的洪流，織成了國民市場的巨網，於是，封鎖的農村經濟，都要受它的化合與貨幣經濟發生了不解之緣，促進了農業商品性的激增。』」

除前面所說的農奴解放與鐵道建設二項以外，俄國彼得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遠游西歐，考察工業，大量借用國外技術人材，以及後來朝野歡迎國外資本的踴躍參加，也不失為促進工業革命的遠因或助因。

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匯集一起，使十九世紀的俄國，忽然趕上歐美，而且超過他們。如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之中，關於銑鐵的生產量，英國增加百分之十八，美國增加百分之五十，德國增加百分之七二，俄國竟增加百分之

百九十；關於石炭的採量，英國增加百分之二二，德國增加百分之五二，美國增加百分之六一，俄國竟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不但重工業超過歐美，而輕工業也一躍而起。如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關於紡錘的增加，英國佔百分之三·八，美國佔百分之二五·六，歐洲大陸佔百分之三，惟獨俄國以百分之七十六，取得首席地位。

帝俄在十九世紀雖如此致力於工業建設，但以其土地問題的糾纏，對日戰爭的慘敗，以及政治上的風波時起，仍是外強中乾，於第一次歐戰之際，由敗北而終於崩潰。

革命後的蘇聯，自一九二八年起，用計劃的方式，革命的精神，專心致志於工業建設，（尤其是重工業），時間雖短，而成就頗大。

日本和帝俄時代一樣，是在深厚的封建基礎之上，圖謀工業之發展的。不過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即日本的工業得力於對外戰爭的勝利，這是它最佔便宜的地方。這一點，連日本人自己也承認的。如日人內田繁隆在「日本社會經濟史」中，即明白指出這個意思：「維新以後的資本主義，以中日戰爭為第一轉形期，激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以日俄戰爭為第二轉形期，激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這革命演進到歐洲大戰，更加幸運似的得到飛躍的發展，由「質」的變革來看，日本當第一次及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是由商業資本轉進到產業資本，而以歐洲大戰，為飛躍的契機，造成了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強霸」。我們如以這個時期為日本資本主義的近世後期，則歐戰以後便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現代時期。

此外，如日本強調工業上的保護政策，利用國外資本的大量流入，以及「維新意識」成長之迅速，也是日本工業成功的因素。

但是工業革命後的日本，因為封建殘餘勢力，仍在頑強，本身的自然資源，不足敷用，貪圖戰爭的便宜心理，時時作祟，所以它的近代經濟，是生吞活剝似的吸收，畸形腫脹似的發育。

第二節 中國的工業革命

一、中國工業革命的發動及失敗

二、「實業計劃」與工業革命

三、國父指示中國工業革命之方針——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使工業建設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

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崎嶇的險惡的。由這崎嶇的，險惡的過程中，學習了珍貴的經驗，開拓了自己的前途。

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一次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把當時不知天高地厚的清朝紙老虎戳破了。朝野有頭腦的人物，受了這次失敗的嚴重刺激，漸漸恍悟非學習西洋的聲光電化之學，堅甲利兵之術，絕不足以圖強自存，抵禦外侮。這種心理上的覺醒，釀成了歷史上有名的「洋務運動」。薛福成云：「若夫西洋諸國，恃智力以相競；我中國與之並峙，商政礦務宜籌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攷工製造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病，使才之優絀，兵制陣法之變化宜講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堅而我脆。」李鴻章亦云：「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豈不誤國。公義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奈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口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儘可自立，若不強則事不可知。」這些話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來洋務運動關係國家的盛衰存亡，如何迫切！這個洋務運動，始由心理的覺醒，繼作口頭的呼籲，最後便進到實施的階段了。實施的內容，雖缺乏總體的計劃，而其要旨，總不外乎以科學技術，加強國防力量：

一八六五年八月設立上海江南機器局

一八七〇年十月設立天津機器局

一八七二年五月開採煤礦鐵礦

-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招商局成立
-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創辦鐵甲兵船
-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學習火輪機器，兵法，砲法，化學，電學各科
- 一八八〇年七月設立天津水師兵船
- 一八八〇年八月設立電報局
-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奏請建築鐵路
- 一八八一年四月設立開平礦務局
- 一八八一年六月國營商船初航
-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招商局接辦各省電報
- 一八八七年開滇河金銀

這些工業的設施，一因頑固份子的強烈反對，二因官僚主義的腐蝕摧毀，三因精神方面的科學運動沒有樹立起來，所以甲午一戰，中國竟被日本打得一敗塗地，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締結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此次慘敗，使有識之士更進一步的覺悟出來，只有聲光電化之學與堅甲利兵之術，並不足以抵禦外侮，奮發圖強；必須先有現代的政治制度，或者先有救國的革命思想，發生領導作用，那末，這些科學技術，才能發揮無比的力量，於是政治問題與革命思想從這主觀的意識與客觀的情勢裏面滋生壯大起來。

政治問題與革命思想互相激盪的結果，使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崩潰覆滅，空前的共和政治制度宣告成立。這個新政治制度成立以後，本應運用其本身的權力，加緊推進科學完成工業建設以防止外患的侵襲，不意官僚得勢，軍閥橫行，只知升官發財，而不計及現代國家之建設。雖說民國四年日本提出狼毒的二十一條，仍未能提起他們的反省覺悟。

到了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大家都高喊「擁護蔡先生」了，但是擁護者只採用科學方法研究文學哲學，那想到以科學技術建設中國的工業呢。所以形式上，科學走了一次紅運，實際上我們的工業並未得到甚麼裨益。

恰當此時，國父從事於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問題，寫成了六個計劃，即「物質建設」一書。國父在此書自序中有云：「此書為實業計劃之大方針，為國際經濟之大政策」。換言之，它是工業革命之寶典，工業建設之規範。我們想一想：從民國十年十月十日他作此書自序之日起，能於十年以內，完成了這偉大的六種計劃，敵寇何敢於民國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變？現在距國父作此書之日，二十餘年了，而此種偉大的工業建設計劃，依然沒有完全實現，我們深覺萬分惶愧，對不起我們的國父，對不起我們的國家。

中國的工業革命既比西洋落後甚遠；而西洋工業革命的結果，又成為個人自私自利的淵藪；所以國父主張中國須把第一工業革命，第二工業革命，同時並舉，以免再行延誤。他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中有云：

「中國今尚用手工為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其第二步革命者有殊。故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於斯際中國正需要機器，以營其鉅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礦產，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之事業。」

這一段話很明白的表示出來中國工業革命的特質，既須迎頭趕上西洋的機器文明，又須實行統一的國有計劃，一步當作兩步走，這是最經濟的革命辦法。

下面就這兩種特質，分別略述其進展的途徑。國父在「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一文中，主張中國實業發展的途徑，要從資本與人材着手。他說：

「我中國地大物博與美國同，而吾國農業之豐，比之美國有過之無不及。彼實業大王所舉之發展四要素，勞力之人工，我即四倍於美國，主顧之社會，我亦四倍於美國，我國所欠缺者：資本也，人材也。倘我國得此兩要素，

則我之實業發達，不特可與美國並駕，且當四倍於美國也。然則欲圖中國實業之發展者，所當注重之問題，即資本與人材而已。」

關於資本問題，國父具有精闢的見解，認為「資本即機器，機器即資本；要想解決資本問題，歡迎外資，亦即歡迎機器。」

至於人材問題的解決，國父主張兩種方法：

「一為多開學堂，多派留學生到各國專門學校肄業，畢業而後，再入各種工廠練習數年，必使所學升堂入室，回國能獨當一面，以經營實業，斯為上着，然此非十年後不能成功。而當此青黃不接之秋，急則治標，故必須廣羅各國之實業人材為我經營創造也。」

「有了很多的機器作為資本，有了現代的人材，運用資本，於是中國的工業革命，便奠下了充實的基礎。以此基礎為起點，沿着國父的「實業計劃」這一條大道向前進行，何患不能迎頭趕上西洋；又何患不能後來居上。文藝復興發源於義大利北部，但是蒸汽機確在英國發明。英法的工業革命均在德國美國之前，而後來德國美國的業工却反比英法發達。只要有決心，有目標，有方法，這些迎頭趕上與後來居上的史例，很足以興奮我們使我們邁步以進。

機器為工業革命的資本，人材為工業革命的主力，「實業計劃」為工業革命的重心；而目標呢，國父亦有明白的指示：

「倘能藉此機會，利用歐美戰後之機器與人材，則數年之後，吾國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惟所防者，則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耳。防之道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鑛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以所獲之利益，歸之國家公用，如是，則凡現存種種苛捐雜稅，概當免除。而實業陸續發達，收益日多，則教育養老救災治病，與夫改良社會勵進文明，皆由實業發達之利益舉，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歸之國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

覆轍，甫經實業發達，即孕育社會革命也，此即吾黨所主張民生主義之實業政策也。凡欲達真正福國利民之目的者，非行此不可。」（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

爲什麼主張工業革命不但要發展實業，還要顧及實業發展後的福利問題呢？這有兩方面的道理，第一，從革命理論方面說，國父認定「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久無窮期的。」第二，從西洋工業革命後的流弊看，工業革命如不注意民生問題的解決，「縱使將來國富民強，不出數十年，一定要受歐美今日這樣的痛苦。」

國父根據這幾層道理，堅決的主張中國工業革命的特質，要技術革命與社會福利問題同時解決，以期趕上西洋工業的發達而無西洋資本主義的流弊。西洋資本主義的本身，因爲未全注意到社會福利問題，陷入到營利主義的深淵，這種嚴重的病症，中國在發展實業的程途，是應該特別警惕的。國父在這種遺教中，曾再三諄諄訓示，使我們深切了解生產問題與社會福利問題是中國整個經濟問題的核心，必須相輔相應，方不至於發生跛行的病態。

第四節 技術觀念與工業化

一、技術的起源與進化

二、所謂「技術時代」與「技術政治」

三、農業社會的技術觀念

四、技術革命的必然性

五、現代技術觀念所涵育的社會意識與工作方式

技術有廣狹二義之不同。廣義的是指器官技術（如清歌妙舞的技藝）與器具技術。狹義的是專指器具技術（如

農工業的生產方法)。本節係就狹義的方面以推論技術的要義。

由遠古的歷史看起來，器具本是由器官發展出來的；及器具逐漸發展以後，人類才脫離動物境界，單獨創立文化，屹然稱雄於大地之上。所以富蘭克林(Franklin)把人類的定義，下做「製造器具的動物」，旁里柯克(Auton Parnecock)認為動物的器官和人類的器具是人類和動物的主要差別。就連那倡導唯心哲學最力的柏格森(Bergson)也認為「人不是生物中最聰明的，乃是生物中最會製造器具的。」

器官與器具，最初的意義是一樣的。及演變既久，器官僅為動物身上自然發生的工具，器具才成為人類自己創造的工具。換言之，動物只依靠器官而「生存」，人類便利用器具而「生活」了。

人類自木器時代起，經過曙石器時代(Eolithie Age)舊石器時代(Palaeolithie Age)新石器時代(Neo-lithie Age)紫銅器時代(Copper Age)青銅器時代(Bronze Age)鐵器時代(Iron Age)到了現代的蒸氣機器時代或鋼鐵時代(Steam machine age, Steel Age)無不是常以器具技術的革新，轉變時代的標誌，開拓人類的的生活。所以有人認為十八世紀的發明是「向技術之國第一次英勇的進軍」，似不大合乎歷史的事實的。不過是十八世紀以來技術的發達，超越過去，以至於「技術化深入人類的血脈之中，廣延到近代文化的一切領域」，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因為技術超越過去，影響深廣，有些人便歌頌「技術的奇蹟」，推崇現代為「技術時代」，現代的政治為「技術政治」。姑無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總可以看出來技術在現代之權威。

但是有些人認為現代社會的災害，完全由於技術的腫脹，如格萊麥爾(Richard Grimmel)所云，「技術的興起，按作用來說本是為人類謀幸福的，然而它竟變為宰割人類與少數人謀利的工具，使全世界的生存受了窒息，全人類的心靈患了痺癱，以至於整個社會呻吟于憂患災難之中。」

我們對於技術的意見，認為技術的本身是應該推重的，至於因為社會組織或人類思想的背謬把技術引入邪道，

遺害人類，不應歸罪於技術的。我國人的技術觀念素極薄弱，對於這一點，尤應認識正確，不可因為幾個西洋人有厭惡技術的表示，我們便盲目附和，自誤工業化的前途。

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輕視技術的觀念。如儒家哲學就具有這種思想。「論語」上「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這樣把農圃看成「小人」之事，其影響所及，凡有地位有智能的人士，莫不沈湎於觀念生活，而與實際技術越離越遠了。「二千年來中國農民始終以古老的耕種方法維持生活」，未始不是受了這種影響。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並有顯著的重農政策，而對農圃的技術尙認爲「小人之事」，至於農圃以外的工業，更不必說了。

這個歷史上深遠的遺風，一直到了清末，受了西洋技術文明的刺激，仍能倏然改變。如在李鴻章時期，竟有人「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紀澤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大譁，終年不息。」劉銘傳請築鐵路，張家鑣奏疏有云，「民間車馬及往來行人，恐至擁擠磕碰，徒滋騷擾。」還有更奇怪的，上海吳淞之間的鐵路修成以後，因遭朝野反對，竟又拆毀，變爲廢物。如此愚見，完全是自古以來輕視技術的流毒。流毒所及，使我國在清末的初期工業運動，好像有希望的幼子受了心理上的憎惡，不久便爲之夭折。

這幾年來的抗戰，全國人嘗到了技術落後的苦痛，於是推重現代技術的新觀念，才空前的昂揚起來。今後如何因勢利導，使成爲工業建設中的主流，在教育上，經濟上，以及社會風氣上，都應有明確的方針。

在教育上我們要認識現代技術與自然科學恰似雙生的弟兄，雖一個偏於理論，一個偏於實用，而是互相交流，互爲輔翼的。中國知識分子素來只注意觀念生活，與文字上的空談，尤應有深切的覺悟。抗戰以來，技術人員的地

位及待遇，好像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這一方面表示中國的技術人才何等缺乏，他方面也可以透露出來技術的聲光，將要繼長增高，大有發展的機運，今後為建設工業擴充技術教育，最好運用這時心理上的轉變，以求事半功倍。

△抗戰以前，因為工業幼稚，辦理技術教育的結果，大有「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傷感，於是學工者當縣長，學農者幹旅長，學商者作政客。乃成為必然的結果。戰後既然要致力於工業建設，這種病態的現象，當然沒有復發的可能。

▷在抗戰時期，技術人員中有些因為從經驗上學得了一技之長，便心滿意足；有些從學理上研究一點成績，便目空一切，這就違反了自然科學的態度。「自然科學時時在進步中，物質技術永遠在革命中」，一切技術人員應該常常懷着這個念頭，小而個人，大而一國，才有趕上日新月異的技術文明之資格。

從經濟的進化看，機器技術是從手工發展出來的。霍布孫(Hobson)說：「如果器具離開了工匠個人的直接指揮而由別的機械設備來支配它的活動，那末，器具便變成機器之一部。」

這種機器技術的誕生，一方面變革了封建社會，他方面創立了新的世界。我們從這個歷史上的界碑，認識人類經過了漁獵，游牧，農業，手工業幾大階段，達到了機器技術這個高峯，才有偉大的進步與豐富的希望。無論那個國家，那個民族，不進步與希望則已，如求進步與希望，必須登上這個高峯。

最初，西洋工業革命時，曾有破壞機器，憎惡發明的事實。如一七五八年瓦特製造火車模型，一八〇一年，特萊微替克(Trevithick)製造實用的軍用車，一八一二年斯蒂芬孫(Stephenson)改良火車的構造，當時竟有人稱呼這些發明為「討厭的魔鬼」，「行走的妖怪」。可是人類心理上的惰性依然阻擋不了這個偉大的技術革命。

國人生息於舊技術之下，心理上的惰性尤為根深蒂固，對於技術革命所引起的歷史轉變及經濟進化，往往不易

體驗出來。在這抗戰時期，因為海路斷絕，舊的技術忽然棄機興起，如手工式的紡織業，製紙業等等，莫不利市百倍，大走紅運，未嘗不足以增加舊技術的社會地位，妨礙國人對於新技術的認識。

這種情勢，在戰後是要改變的。不惟手工業要漸受淘汰，就連那技術上不是最進步的工業，也難有立足之地。所以無論手工業者，機器工業者要認識歐美技術的突飛猛進，以謀戰後新工業之建設。在工業家方面，要選派人員到英美考察工業進步情形，或約聘國內外技師以新的技術訓練技工。在政府方面，要規定技術的標準，並由政府設立示範工廠，作為公共仿效的楷模。

總之，在經濟方面採取最新型的技術與合理化的標準為今後工業化的正規。否則，就永遠望塵莫及，不得列入富強之林。

除了採取最新型的技術與合理化的標準以外，在社會風氣方面，所謂現代技術觀念的社會意識與工作方式，也有積極培養的必要。所謂現代技術觀念的社會意識與工作方式，並非主張社會如機械般的結構，生活如物質似的僵硬，使人類相互之間，冷落隔膜，毫無情味之可言；乃是主張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更為緊湊，更為和諧；每一個人的工作方式，更為積極，更為樂觀。

在農業社會過慣悠閒自在的人，當然討厭工業社會那種匆忙繁雜的生活；在工業社會過久的人，也有認為這種生活缺乏了烟士披里純，或人生風趣的。如聞名的經濟學者桑巴特常有這種思想的流露以誘惑人心。他說：「今日的人——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人——實在是一『驚悸人』」的模型……今日我們西歐文化中的人們，比之從前……多麼深陷於物質之中……所以人類的閑適心靈是沒有了，剩下來的荒野部分，不連貫，不安定，躁急，空虛，僵硬起來了。心田的柔性部分漸漸遺棄，而意志則倔強的發展起來。人在情感世界上，是荒野化了，而在知識上也成了畸形不發育的狀態。毫無疑問，我們這時代的人比以前的人愚笨多了。十七十八世紀的學者，要比十九世紀的，聰明得

多；就連那鄉野的牧羊童也比工廠工人聰明些，舊式的家庭主婦也比女學生聰明些。」

這些話，從工業最發達的地方體驗出來，確可以打動人心，尤足以迷惑農業社會的人士。以社會進化的眼光觀察之，這都是田園詩人的想法或書齋哲學家的偏見，完全沒有顧到芸芸衆生的幸福。

再以通俗眼光批評之，說這些話的人，無異乎富人對窮人說：『飯是喫不得的，喫了就得胃病。』豈不是自欺欺人，故意說違心之言麼？我們若果信以爲真，就等於甘願餓死而不知覺悟。我想工業落後的人，絕不至於如此盲目，受這種言論的催眠。

中國現在還是一個農業社會，對於技術觀念下的社會意識與工作方式，一時尙不易欣然承受，所以提倡工業化的人，要緊防這類反技術反科學的意識潛生蔓長，匯成一道暗流，衝毀這固根基未固的工業陣地。

第一章 工業化的必要

第五節 由三種社會生活的比較論中國工業革命

一、殘餘的游牧生活，濃厚的農業生活，微溫的工業生活，形成中國經濟上不平衡的發展

二、農業社會是封鎖的，停滯的，貧乏的；工業社會是進步的，廣大的，豐富的

三、工業建設成功以後，可以解決人口問題

在中國廣大的社會中，邊疆有殘餘的游牧生活，內地有濃厚的農業生活，沿海有微溫的工業生活。以三種生活的並存，形成不平衡的發展；以農業生活現出濃厚的色彩，仍停滯落後的境界。按社會的進程來說，中國亟應着重於工業的發展，使全體國民進到現代化的生活園地。因此，特就三種社會生活的類型，略予比較，以證明中國工業化的必要。

游牧民族沒有一定的住所，文化程度是很低落的。前漢書上說：『匈奴逐水草遷居，無城郭，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東胡族的女真，也是游牧民族。新五代史上說：『女真善射，其人無定居，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復解，不然，則殺人。』現在我們邊疆一帶的游牧人民，雖比古代的游牧民族，較爲進步，但進步程度，甚爲微小而遲緩，所以仍不能與內地的農業文化相伯仲。

游牧人民的文化固然遠不如農業人民，而其貪得的慾望確比農業人民強烈得多，米勒利爾說：『貪得無厭的慾望，最初發現於牧畜民族。牧畜可以自己繁殖，確具有資本的要素，所以牧畜民族有資本制度的傾向，只有曾經過牧畜階級的民族才獨立的進到資本制度。這也是有趣的事實。』

游牧民族具有這種貪得的慾望，而又曠悍好戰，所以常以大隊人馬遠征異域；惟因文化低落，技術簡陋，所至之處，那只有破壞之力，而少建設之功了。奧本海姆云：『舊世界充滿了著名遠征的事例，……這些羣隊（指游牧羣）超出慣行劫掠地域以外而泛濫於全歐。他們退休，歸去，滿載，所遺留者，一片荒郊而已。』

由游牧生活進到農業生活，也是人類重要的產業革命。自從這個革命以後，人類才有剩餘生活品的可能，才有從事精神文化的餘裕。

農民的生命線因為建在土地上面，所以都很願意安居故鄉的；非有不可抗的災荒，戰爭，絕不離開他的老田祖業。就令偶然離去，後來若故鄉有一線生機，仍然回到他們的故鄉去的。奧本海姆說的真對：『農民是永遠缺乏活動力的，他粘着於土地，與所種植的植物粘着於土地相同。』因為農民如此安土重遷，抱定家族的自給自足政策，在經濟上，就很難促進生產交易的發達；在文化傳播上，就很難使各地文化有接觸融會的機會，所以農業社會常常是「停滯的社會」(Static Society)而不易變為「流動的社會」(Dynamic Society)。

停滯在家族中，停滯在鄉里間，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鷄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十里之間。」確是農民孤立生活的寫照。

換言之，這種社會，一面否定了工商社會之實現，一面乃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地方共同體為理想。中國歷來的經濟政策與政治目標無不迷戀於這種理想的雲霧。

農業人民的社會觀，人生觀，都是自然主義的。因為他們的家族組織是由於「血統關係」而產生的，他們的經濟生活是由於「天時地利」而得來的，他們的時間觀念是由於「日月星辰」而規定的，所謂自然主義的意識，當然深印在他們的腦海中而莫能自拔，所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月日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

而利生焉。」都是這種意識的理論。

這種靠天生存的小農社會，推演所及，大多數人民永遠停滯於狹隘的，落後的生活圈中，而悵望於飢餓的邊緣之上。美國一個著名學者來到中國游歷以後，著了一篇文章，非常慨嘆中國竟如此的貧窮——連自己的生命都難維持下去。

但是有些人，仍然對於這樣的社會生活，表示嚮往的心情，真是不識時務之至。

從農業邁進到工業，更是人類空前的產業革命，如歷史上的急湍，使全人類的生活波瀾，忽然為之壯闊。

在中古的農業時代，大家來往的範圍，不過是一鄉一里而已；甚至於一鄉一里，鷄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農業生活的狹隘封建之情況由此可見一斑。一七五八年瓦特製造火車模型，一八一二年斯蒂芬森改良火車的構造，當時社會所稱呼的「討厭的獮鬼」，「行走的妖怪」，竟把狹隘的生活，開闢廣大。繼而又有輪船的發明，更把封建的壁壘推翻，引導全世界人類從閉關的樊籠裏面，走到新鮮廣大的天地。

全世界人類從此互相接觸，互相感應，構成國際化的大社會。

工業不僅在空間上，擴大了我們的天地，而在時間上，也增強了我們成功的信念。農業社會裏面，往往把人世看成是循環的，或者是退化的，這是何等的令人心灰氣沮！到了工業社會就不然了。它是常常懷抱「人定勝天」的信念，瞻望着社會進化的美景。人類受了這個思想上的感召，無異乎增加了無窮的生命力，鼓舞着人類，前進，前進，迅速前進，人類便如生龍活虎似的活躍起來。

在這廣大的天地之間，具有這樣活動熱力，一切莫不顯現雄偉的姿態——百層的摩天樓，凡十萬工人的工廠，以及十七八萬萬人類組成一個經濟上的密網，那真是農業時代夢想不到的。

工業建設不但使人類的空間為之「廣」，時間為之「速」，規模為之「大」，就連人類的壽命也「延長」了。

在德國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二六年男子由三五·五六增加五五·九七歲，女子由三八·四五增加到五八·八二；在法國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由四〇·八五增加到五二·二歲。人類的壽命延長了，增加了，歐洲在一八〇〇年，總共不過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而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竟增加到一倍半——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人口增加這樣的多，人壽增加這樣的長，是不是過着疾苦的生活？不是，不是，絕不是，他們藉着機器生產的技術，多半過着豐富的現代生活。這種生活因為有十萬萬以上馬力的馬達，代替人類工作，人類的工作能力已由四千卡路里加到十六萬卡路里，若非受戰爭影響，當然可以愈加豐富的享受下去，而不至於逆轉。

有人認為中國之窮原於人口太多，應該減去一半，藉使一般人的生活水準提高，這是迷信馬爾薩斯及山額夫人的結論。豈不知中國如不工業化，就令減去一半留下二萬萬人口，亦難過豐富的生活。假如全國能夠工業化，並用工業技術改進農業，別說二萬萬，四萬萬，就令六萬萬，八萬萬，亦可以豐衣足食。國父說：「法國四千萬人，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之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喫。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廿倍，如果能夠仿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這一段話所謂改良農業，一定是以科學技術的方法促進農業。換言之，即是農業機械化，農村現代化，使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也能夠過現代工業化的生活。

第六節 由社會改造論中國工業化

一、現代化的主要標誌——德莫克拉西與賽因斯

二、中國將來的出路就是由工業化到現代化

三、工業化對社會組織的擴大，政治風氣的革新都有相當的影響

這一次戰爭激勵了憂國之士對於「現代化」這個境界，揚起嚮往的殷情。究竟現代化的標誌是何所指而云？道

個動人的字眼，真是浩浩然，色色然，從各方角度，都不易測繪它的片影全貌。

有以國民消費肥皂量的指數作標誌的，有以大型報紙銷數的紀錄作標誌的。

至於文盲的百分比，引擎的生產進度，更爲世俗所習用的權衡標準。

較爲體大思精的標準——是以「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的聲光，照臨一切。

這些觀點，根據有機的社會體系，綜合而貫通之，可以納入一個衆星環拱的中樞——工業化。

比如國民消費肥皂量的指數，在農業社會中，芸芸衆生，終年掙扎，尙不足以溫飽，焉有餘裕享受這種文明生活？工業化的社會呢，生活水準增高，衛生的習慣，易於普及，那末，肥皂的消費量，自然而然的繼續增高。

當前，中國還在農業社會的坎坷境遇，無怪乎威爾基氏蒞臨中國，心目中有一個暗影——「髒」字。

報紙的銷行，一面需要現代技術的設備，一面需要國民知識的普及。這兩大要素，有待於工業化協助成全之處

甚多。所以英美報紙銷行一百萬份以上者，視爲常事，而在中國，能銷行三萬五萬份者，就以爲難能而可貴了。

文盲在純粹的農業社會，政府希望掃除淨盡，恐難收預期的效果。因爲那些自然主義，閉關主義的農民，成年

累月，極少碰到用文字的場合；就令施行強迫教育，依然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沒有什麼關聯。但是工業社會則不然，

無論生產，交易，以至於消費，非能讀，能寫，能算（所謂三R教育），即少有參與的資格。在這種條件之下，推

行義務教育以掃除文盲，當然如順風而呼，費力少而成功大。

至於引擎生產的進度，以及賽因斯的發達，與工業化之相須相成，更是如鳥翼車輪，相輔而行，不必再解說

了。

比較難以解說明，是德莫克拉西與工業化的關係，然而一究其內容，也可以揭發其關係的所在。

德莫克拉西的神髓，在乎人民對於政治有參與問的興趣，有監察督促的能力，而着手的方法則在選舉制度。

這些條件，實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的農民心理，有點格格不入，更非連自己姓名不會讀不

會寫的農村人民，所能勝任愉快。至於工業化的社會，人民一般的知識提高了，人民一般的生活，也處處與政府發生關係了，於是過問政治的興趣，日趨濃厚，大小選舉才不易為少數知識份子所包辦。再進一步言之，一旦實行全國總選舉，若幅員遼闊而鐵路公路航路並不發達，選民衆多而計算報告的方法，不能利用工業技術，我們想像那是何等的迂緩而繁難啊。所以推行德莫克拉西，同時，要致力工業建設，方不致於發生跛行的病象。

由上說來，所謂現代化的標誌，無論指那一方面，都不能脫離工業化的影響。換言之，「現代化」不過是現代社會的型相，而「工業化」才是它的中心命脈。一個落伍的國家要想進入「現代化」這個境界，最主要的方法，莫若積極進行「工業化」，使其社會因工業化的影響，得到種種的創新與改造。

工業化對於社會的影響，除前面所說幾點以外，還可從縱的方面與橫的方面，以引申之。

所謂縱的方面是指歷史的線索，橫的方面是指人與人的關係。

馮友蘭先生云：「自歷史方面說，中國以前之哲學家所處之社會是農業社會，其生活是隨天時之轉變而轉異，此天時之轉變，如日月之運行，及四時之代序等，均是循環底。其所處社會雖亦常有改變，而社會始終為一類底社會，故以為宇宙間一切轉變都是循環底」。哲學為一切學術的根本與綜合，哲學既係如此，其他學術也很難脫離這種「循環的，自然的」圈套。推而演之，凡農業社會人民的歷史觀，人生觀，無不是如此。因為他們的家族組織是由於「血緣」而產生的，他們的社會結合是由於「地緣」而建立的，他們經濟生活是由於「天時地利」而維持的，所謂「自然的，循環的」意識，當然深印在他們的腦海而莫能自拔。

工業化社會一面肯定歷史之流的前後關係，一面却「否定」歷史之流的盡善盡美。古人所謂「持盈保泰」係農業生活的規律，在工業社會就永遠不以為「盈」，不以為「泰」，而欣欣然追求着較高的進展。

這種前進的歷史觀，予人類以豐富的活力，樂觀的希望，宛如瀑布流泉，永遠的瀆出浪潮水花來。

根據這個歷史觀的論據，農業社會亟應進步到工業化的社會，真所謂「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然而我國有些人士一面羨慕着工業化的美景，一面却對於農業社會極盡擁護之意，這種心理上的矛盾，無形中拖延了工業化的行程。所以我們就得強調「進步的歷史觀」，以否定農業社會之延續。這是社會進化的鐵則，就令有人固執成見，逆勢而行，也只如老子所謂「執者失之」而已。

至於工業化對於社會橫面的影響，更為切實廣大。茲先就職業與事業的範圍來說明。按分工的進化：由原始時代的「性的分工」到封建時代的「職業分工」，由封建時代的「職業分工」到現代的「社會分工」，已將過去的士農工商繁殖到很複雜很精細的類別。

由這樣繁複的分工，每種主要就業（Primary employment）還可連帶的引起各部門的附從就業（Secondary employment）吸引着各種各樣的人們，各就性之所近，能之所長，分別担任不同的職業。職業範圍既如此寬廣，共同活動又那樣頻繁，於是個人事業與集體事業都隨之有展開希望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行行出狀元」，「界界有出路」，無論經營工商，從事文化，莫不有建樹成功的希望，何必再像農業社會「學優則仕」，更何必常在政治舞台上「患得患失」呢。所以工業化以後，對於政治舞台上的擠鑽營，不啻有消腫解痛的藥力。不但有解消擁擠鑽營之力，還有減少貪污，澄清政風的效用。

因為在工業化的社會，能力發展的地方，所在多有，任何人一旦上台作官，其家族既不必完全依賴他而生活，其親戚故舊亦不必聞風而來，左右挾持，這就於無形中清除貪污的因素不少。

中國過去的社會關係，建築在共同生活的大家族上面，經濟命脈建築在滯澀的農業技術上面，因此，政治上之貪污，個人的道德修養，雖有深切關係，而如此家族環境，如此經濟條件，亦不無相當影響。

中國將來工業化完成以後，大家族的共同生活制，必分解為小家庭的共同生活制，落後的生產制度必邁進到現代化的經濟體制。到了那個時期，一面減輕了個人對於大家族的責任，一面增廣了職業事業的園地，所謂「升官發

財」的連環套，多少失去了寄生殘存的餘地。

再深一層言之。人類由血緣地緣社會進到社緣社會以後，於是組織的要素，不復以「血緣地緣」為主體，而以「社緣」為核心了。從這個見地，可以指明出來在今後工業化的過程中，社會組織的範圍一經擴大，則息息相關的精神，以及文化創造的能力，亦必隨之增進不已。社會學家米勒利爾(Miller-Lyer)說：「人相聯合，才有偉大的生命與強大的能力。因此，創造的能力與聯絡各種進步的創造力，也要在各團體相聯合成為更高的組織以後，才可以得到。」這個理論應用到實際上面，只有期待工業化的社會，像那封鎖的農業社會，我們何敢存這種奢望呢。

通過工業化的力量，使自足自給的農業人民，由其家族藩籬，及鄉村田園移植到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廣大組織中，本是現代社會的動向；然而有些人却總認爲現代工業文明的組織性，缺乏生機且有危險，其實，現在工業的組織性所以發生弊害，確係另有原因，我們何可因噎廢食，自誤建國的前途。這次大戰，就是很精彩的課文，教我們對於工業化的組織性，不容忽視，更須努力。

固然，工業化的結果，也不免有好些流弊，如個人財富的膨脹，精神生活的失調，景氣循環的劇變，但是這些流弊，我們可以主義的力量實施計劃經濟，在事前防其發生，在事後以謀診治，總不至於重蹈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國業生活的那種覆轍。

第七節 中國戰前戰時的社會變動與工業建設

一、秦漢以來中國社會停滯的原因

二、近代中國社會的劇變

三、中國經濟之難境

四、戰時社會的變動與工業建設

中國自秦漢以來，何以社會沒有很大的進步，永遠停滯在農業階段？從社會學的見地，這大概有三個原因：

一、由地理的原因看起來，世界文化發展的路線是由江河而內海，由內海而大洋。中國文化的起源，係源於江河，後來雖由西北而趨向東南，但是始終留戀於江河之間，未能深入內海與遠洋。

二、由社會的原因看起來，封建的與宗法的氣味過於濃厚，使個人缺乏自由競進的餘地。封建是以「地緣」為結合的因素，宗法是以「血緣」為結合的因素，一個是橫面的，一個是縱面的——一縱一橫，把人人的精神身體無形中都束縛起來了。

三、由經濟的原因看起來，封建宗法時代的財產觀念，大部分在土地上面，而土地受漸減法則的限制，生產力是不能隨時增加的。以生產力有限的土地，養了滋生不已的衆多人口，於是土地資本愈腫脹，而一般人的生活愈困苦。

有了這三個原因，所以直到清末，仍然是一種封建性的社會形態。

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列強挾持其銳利的武器及新式的工業品，浩浩蕩蕩的闖入中國。中國忽然遇見這些陌生的外人，始而輕視，繼而恐懼。無論你輕視也罷，恐懼也罷，他們是要源源不絕而來的。中國自從遭受這個空前的事變以後，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以至於很細微的衣食住行，無不發生變化。這些變化起初還可自己作主，後來越過越難了。就大體觀察，初與外人接觸時，如能及時努力，迎頭趕上，奠下了富強的基礎，以後便可以免除外人的壓制。否則，時機一過，必陷於進退兩難的苦境。日本在明治維新是及時努力，迎頭趕上了；而中國呢，一再蹉跎，終陷於進退兩難的境遇。如中國舊有的農業商業，手工業，既因帝國主義的打擊，瀕於破產，而新式的工商業，亦因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不能自主的發展。

從社會進化史上觀察，凡是低級的經濟勢力，遇見了高級的經濟勢力，前者必敗，後者必勝。中國的農業手工

業遇見了國外的新式工商業，中國經濟是低級的，自然沒落；國外的工商經濟自然日佔上風。但是中國舊有的經濟雖開始沒落，而其殘餘的勢力，因封建關係，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社會裏面。於是舊有的經濟既未完全沒落，而外來的經濟勢力又繼續增高——這兩種新舊經濟的衝突矛盾，遂使中國變為一個複合形式的社會，外重內輕失去平衡的社會。

總之，中國在清末以前，始終停滯在農業圈中，沒有走上工業革命的大道上去。及清末受了外來的嚴重打擊以後，才轉向工業革命，以圖挽救。只以方法失當，誤了大好時機，遂致國內經濟因外面壓力的驟強而日趨衰落。現在不平等條約業已廢除，國外的壓力總可解除不少了，所以工業建設的大好時機，又重行出現於吾人之前。

不僅只外在的不平等條約之解除，有利於工業建設；即抗戰時期，國內社會的變動，也有其利於工業建設的地方。略舉數點，以資策勵。

第一項是新經濟中心的建立。「八一三」後，沿海一帶的工廠，在烽火空襲之下，開始西遷的艱苦工作。二十八年止，重要工廠西遷者，有三百五十餘家，機械噸數在十五萬噸以上。其中有機器工業，電器工業，陶器工業，化學工業，紡織工業，煤礦工業，及印刷工業，遂然使西南各省形成了新經濟活動的中心。這些新成立工廠的汽笛，與運輸機車的馬力，衝破了西南各省幾千年來的寂靜。

第二項是人口移動與文化傳播。因為中國近代的工業革命，沒有迅速的開展，大多數的人民，仍然過着農業經濟的生活。農業經濟是自然的，狹隘的，固定的，農業經濟下的人民，當然是安土重遷，非遇有不可抗的災荒和戰爭，絕不離開他們的故鄉，以如此安土重遷，孤立保守的狹隘生活，在文化傳播上，就很難有社會貫通的機會了。

中國此次對目的空前大戰，掀起了人口東遷西移的巨大浪潮，變革了安土重遷孤立保守的生活領域。據估計，東部諸省遷入西南西北者約有六千萬人。此六千萬人能夠離鄉背井，遷移遠方，多半是有能力的，有知識的。以

六千萬有能力，有知識的人口，移動起來，那末，對於文化傳播上當然很有深遠的影響的。現在，西南西北各省的民俗，與東南東北各省民俗的融合，城市文化向遠鄉鄙野的貫注，以及邊遠地方文化水準的提高，都是最顯著的例證。

第三項便是社會力的凝聚。社會本質本含有擴大的趨勢；個人隨着這個趨勢，必然的向集體方面發展。由家族變為國族，由一鄉一里的自足自給進化到全國的協同一致，都是隨着這個趨勢而向集體方面發展的。當被侵略的國家起而抵禦侵略的國家，所謂「集體力量的凝聚」，更易於成長；因為全民陷於危難，力量凝聚一起，尙虞不易挽救，若再分散，豈不是坐以待亡？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受了家族觀念的薰陶，及農業經濟的影響，社會的潛力，最難凝聚一起，無怪乎外國人認為中國文化是家族文化，農業文化；譏笑每一個中國人如一個堅硬的石子，但集合起來，便如一盤散沙了。自從對日抗戰，國人才恍然覺悟個人的生命，財產，家庭，都需要國家的庇護，國家民族才是我們的主體；家庭，個人，不過是附屬而已。這由苦痛的經驗激發出來心理上的覺悟，豈不是培養社會力的液汁麼？

第四項是社會空間的擴大與社會箱 (Social Box) 的開展。社會空間是社會份子互相發生關係的範圍。中國社會由於交通閉塞以及鄉里家族的隔離，還未形成廣大的社會空間，全國人民還沒有發生密切的聯繫，與休戚相關的認識。抗戰的火力，已使全國人民，不論遠近，在精神上發生了密切的感應；精神上既有了密切的感應，再利用交通技術，增加聯繫的力量，那末，中國社會的空間，更易於向廣大的方面發展了。

抗戰初起時，中國航空公司新開航線共長三千三百餘公里，歐亞公司新開航線共長六千三百餘公里，電報線路增加四四八零零五里，郵路新開一萬零四百六十公里，代辦所及村鎮信櫃增加一千二百九十四處——這些設施，對於擴大社會空間，都有效力的。將來鐵道建設的事業，再一一實現，那末，中國廣大的社會空間，便如水到渠成似的完全建立起來。

還有一層，因為戰綫延長，人民遷移不定，使平日安居的人們，忽然與遠鄉異地發生社會關係，亦可促進社會空間的發展。

這些交通的設施，經濟的建設，與大量人口的遷移，從社會方面觀察，是社會空間的擴大，從個人方面觀察，則為社會箱的開展。社會學家沙羅根(Sorokin)在「社會變動論」一書中說：「一個人從事於同一職業，或生活於同一的社會環境中，他的心理，當然為這個職業或環境所限制。他評論事物，他必然根據他的長久社會環境所形成的立場和興趣為標準。他隔離於他的「社會箱」中，使他不能獲得寬闊的胸襟，和善於應變的觀點。」各地的炮火，震破了各個人的社會箱，於是整個民族的胸襟寬闊了，社會空間廣大了。

第五項是社會組織的變革，與社會淘汰作用的加強。米勒利爾說：「在生存競爭界裏，組織更完備，社會更分工，團結更強大，紀律更堅固的，常佔優勝地位。」現在我們的組織，還不足以適應需要，我們要繼續不斷的鍛鍊，革新，方可使全體的精神，透過完備的組織，一致的昂揚奮發。

因為戰爭的革新組織，因為革新組織而發揚精神——這個歷程，就潛伏着很大的淘汰作用。沙羅根以為「國家遭逢着大的危險，乃是將帥士卒與一般平民顯揚生命力的最好時機，」如克林威爾，華盛頓，凱末爾各時代，頗有這個顯著的傾向。

這樣時代，好比熊熊火焰的洪爐，與細眼密網的利篩，一方面有鍛鍊提拔的作用，他方面有消毀淘汰的力量。所以每次革命與戰爭，固然提升了許多人物，然而也汰淘了不少的落伍分子。如此「縱面流動」，便是社會的新陳代謝。

第六項是社會化的表現。「社會化」這名詞，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是很含混的。社會學家鮑德茹斯(Bodinus)根據各家的學說，解釋得頗為明顯：

「在社會化這個觀念的後面，是伏着「適應的原則」。卡佛爾曾分適應為被動的和自動的兩類。前一類是說到

改變種族本身，以適合所生活的境遇；後一類則是指改變境遇以適合種族。被動的物理適應，包含了生物進化的過程，而被動的精神適應則包括了心理進化，或者語言，風化，教育，……無意的發展。自動的物質適應包括工業發展的過程，而自動的精神適應，則包括個人對於他的精神環境，社會改良，和社會制裁，作一種有意的調適。

「社會化（或社會適應）產生了全部的容忍，調和，順適和結合的作用。從團體的立場說，它（社會化）是由個人心理轉變而為集體活動的要素；從個人的立場說，它是個人參加團體的精神意向，知識方法的定量。所謂個人社會化即是說他自覺地改變其行為，以及形成其目的，以助成更有效力的合作活動，和實現團體的高級目的。」總之，社會化是指同伴間同情心的發展，及合作能力的滋生。這些特點，在平常時期因為共同關係的薄弱，頗不易發揚廣大；但在大敵當前，整個民族在存亡絕續之秋，便較為容易充實擴大了。

我們對於合作運動，社會服務事業，以及團體組織的擴充，都與發展「社會化」的意識有關係的。以上這些特點，都可用來作為推進工業建設以至於工業化的要素。而工業建設以至於工業化的成功，也有發揚這些特點的力量。二者互相為用，「工業化」與「社會化」才可以結合起來，造成一個健壯的社會。

第八節 戰後世界與中國工業建設

一、社會進化論者與現實主義者的戰後世界觀

二、戰後的世界有三種可能性——和平，苟安與戰爭

三、中國的工業建設如果在戰後短期間迅速完成，處變固無所畏懼，處常亦可以有所貢獻於世界

戰後的世界，將往何處去？我們一想到這個問題，真是覺得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什麼？
社會進化論者以為人類經過了「試驗與錯誤」的歷程，受了這麼樣歷史上的大磨折，總可以協同一致，立下決

心，洩出戰爭苦海，共求永久和平的實現。如柯爾特提遜(Carlleton)在「一個世界聯邦的建議」一文中說道：「這次戰爭是我們拯救自己的最後時機，我們要與各國合作建立一個開明的合理的世界秩序。我們必須現在就來計劃，必先將重心建立在我們意志的堅石之上，美國能夠做出其他各國未曾做的事情，向各國宣佈全世界的永久和平。」胡適在「論戰後的和平」中亦說道：「科學與技術已經把世界在實質上造成一體，但是因為人類政治思想與計劃的落伍，所以這個在實質上已經統一的世界，還沒有變成一個政治的與道德的世界社會。……人民若肯決心使這一次戰爭成爲「最後一次戰爭」，就必然會發生一種強有力的要求來終止國際的無政府狀態，並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若引用大西洋憲章的話，這新的「世界秩序」將「予世界各民族以其境內安全居住之憑藉」，於是胡適由這個熱切的希望，提出了三個最低限度的和平要求。有名的歷史家威爾斯(H. C. Wells)更以警醒的筆鋒，發表「未來世界和平的十大要點」，希望全人類進入新生活的園地以免再爲悲慘的死滅的命運襲擊。有社會思想的政治學家拉斯基(Laski)所提的戰後意見雖沒有威氏的具體，但是他根據四種自由邀請國人希求理想的勝利，而以爲新的和平世界有建立之可能。

這些言論，均足以提高反侵略的戰鬥精神而增加新世界建設的信念。但是戰後的世界局勢，究竟怎樣演變，似乎不易有絕對的把握，保障它的成就，全合我們的理想；所以樂觀的言論雖頗盛行，而戒懼的意見，亦在滋長。

懼什麼？

社會輪化論者分析人類二千五百年的歷史，乃竟有九百零二次戰爭，一千六百十五次內亂，創立了「戰爭週期說」，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將如宿命似的不可避免。

現實主義者在下意識裏面受了這種推論的影響，想重溫近代的外交作風，企圖建立「新的均勢」，使鵝蚌相爭相持，藉收漁人之利。

十九世紀以來，列強往往以維持均勢(Balance of Powers)為手段，敷衍一時的苟安；但是因為列強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政治勢力消長的不一致，以及軍隊之強弱，人口之多寡，在在足以波及「均勢範圍」而釀成大戰。美國已故海長諾克斯云：「舊日的均勢制度乃製造戰爭之溫床，無經濟的合作，將不能有持久的政治安全。」可謂一語道破，給現實主義者當頭一棒，叫他猛省。

邇來這些現實主義者如耶魯大學教授斯派克曼(Spaulding)在美國宣傳，「此次大戰後，應使中國與日本在遠東成立新的均勢，使蘇聯與德國在歐洲成立新的均勢，然後美國可以高高在上，擺出來英國式的光榮孤立。」在他們的心目中，日本強大了固然威脅美國，而中國強大了也未必與美國有利，他們既沒有認清楚中日的立國精神與民族性格截然不同，又沒有看到均勢政策在國際史上已經是一具殘骸僵屍，所以才有這種不幸的論調。

由上看來，戰後的世界，究竟是那一種局面？從理論上講，可以有種種的看法，而在事實上，就很難確定是那一種了。因為國際間的微妙關係以及史地的因素之複雜，如果一口咬定戰後世界的局勢屬於那一個類型，那顯然是過于盲從或獨斷，不適合客觀的情況。

根據各方的見解。我們可以推測戰後的世界，在實際方面，大概有三種的可能性：上焉者同盟國家尤其是中英美蘇發揮大西洋憲章的精神，衷心合作，建立永久和平。中焉者各國始而合作，繼而齟齬，終而散夥，維持一個很短時期的苟安。下焉者，新的均勢不幸成立，各國揮闔縱橫，磨刀霍霍；於是第三次大戰及早爆發，連短時期的苟安亦不可得。

簡單言之，戰後的世界，不外乎「和平」「苟安」與「戰爭」。在主觀上，當然我們要誠懇的希望和平，更希望永久和平；但是在客觀上是否如此，那真是「未定之天」。

退一步言之，從這次大戰方面之廣，時間之長，犧牲之大，全人類于痛定思痛之餘，必對於戰後的世界有一種

強烈的要求使其比從前進步。所以永久和平雖未必一定的實現，而國際間的經濟合作與生活改善制度，將要裏心的創造成長，不過「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這樣艱巨的工作更不易忽然成功。因此我們對於戰後的世界不可過分的樂觀，亦不可純粹的悲觀，而應以嚴肅態度，遠大眼光，正視現實，矚望將來。尤其要緊的，是要自知我們的國際地位，雖然因抗戰數年之久提高不少；而我們的實力，仍難與列強相比，我們更不可滿懷着空想或依存的熱望，以鬆懈自己的努力。

總之，上面所說的三種戰後局勢，無論那一種實現以後，我們若想置身其間，因應自如，必定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即是本身須具有現代化的真實力量。如果本身具有這種力量，「處變」固然無所畏懼，「處常」亦可以有所貢獻於世界了。

假定戰後的世界，能夠建成美輪美奐似的和平殿堂，那末有現代實力的中國，才有資格進入這個殿堂而為其中的彫梁畫棟之一。否則，以貧弱之身，落後之邦，就令讓我們參加，我們也覺寒慙愧汗，起不了什麼作用。

所謂現代化的建設方面固然很多，但是要以「工業化」為要道，其他不過是支路而已。抗戰時期，所謂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到了戰後，便應改為「工業第一」「建設第一」了。這幾年，我們親嘗物質缺乏的苦痛，敵人炮火的凌厲，耳聞噴火坦克建功於馬其諾防綫之前，以及蘇聯三個五年工業化的成就，美國生產第一主義的偉績，在在足以使工業建設的意識，湧上我們的心頭。這個內心的覺醒，必可成為戰後社會建設最有力的精神根據。

我們社會的建設，既然以工業化為要道，就要嚴防「崇拜農業文化詛咒科學技術」的思想之復活。第一次大戰後，歐人於滿目蕭然，感極而悲之餘，硬將大戰的罪惡，推到科學技術身上，遂對於東方的山林文化，表示嚮往的心情。多情善感的梁任公先生當時歐游歸來，著了一本「歐游心影錄」，亦附和其說，大呼賽因斯從此破產矣。這般思想上的暗流，我們要嚴防他乘機蠢動，摧殘科學技術的萌芽。

農業文化和山林文化的特殊徵象是什麼？其宇宙觀念是靜止的自然主義，其經濟思想是自足的餬口觀念，其社會組織是狹小的封建主義，其戰鬥精神是鄉里的防守主義——這些條件，均不足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所以亟須把工業化的優點發揮出來，使我們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趨於一致。

工業化社會的特點，在「力」與「大」。科學技術的特點，在「迅速」與「準確」。我們的社會如果通過科學技術成爲工業化的型體，那末，在組織方面一定是「大」而有「力」的，同時，在社會意識方面，也容易樹立「迅速」，「準確」的風氣。

千言萬語一句話，將來的世界，正路是和平，旁道是戰爭；所以我們社會建設的目標，「在平時要能夠生活，在戰時要能夠鬥爭」。

第三章 中國工業化的困難

第九節 工業化進程中思想上之雲翳

- 一、觀念主義者稱道「貧而能樂窮而能守的精神」
- 二、復古主義者懷念農業社會與欣賞山林文化的意識
- 三、一部分西洋人士唯恐中國工業化完成以後有變為帝國主義威脅世界和平之可能

工業化的力量可以促使國家富強，可以提高文化水準，可以貢獻世界，可以造福人類——中國無論對內對外，非通過工業化這個途徑，絕難卓然有成，真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無容加以懷疑了。但是因為中外人士認識的不清，這一條工業化的途徑，依然有如「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之感。茲略舉這種思想上的雲翳，並申明其謬誤之所在，以免影蔽工業建設的光耀：

名滿世界的羅素（Russell）蒞臨中國講學時，曾讚美中國人「安貧守窮」的觀念：「以予觀之，平均之中國人，雖甚貧窮，但較平均之英國人更快樂。……其在中國，人生之樂，無往而不在，斯中國之文化為予所讚美之大原因也。……好動之西洋人處如此之社會，幾失其常度，而不知向日所為之目的何在。及夫為時漸久，乃知中國人生之美麗可貴」。

羅素這幾句哲學上的見解，我有三點意見批評它。

第一、他從高度工業的國家忽然來到這個聽天由命的農業社會，眼看這些飽經自然憂患而能心平氣和的林林總總，當然，覺得新奇可愛，流露出欣賞讚美的語氣。

第二、中國的人生哲學固然有其優良的傳統，但是由此便認為中國是一個很快樂的很幸福的社會，那未免是哲

學家的主觀，而脫離了實際生活的體驗，違反了社會進化的旨趣。

第三，個人或少數人能夠「貧而能樂，窮而能守」，我們當然要稱道他們的修養之高，但是若整個社會陷於貧窮，不堪與其他各國並立，我們還能夠讚美它麼？若免強讚美，那也是違心之言啊。例如自古所稱道的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不過是揄揚顏回個人的潛心進修，不暇顧及飲食之粗劣，既非教普天之下都是如此，更非希望整個社會永遠以「一簞食一瓢飲」為理想的典範。進一步言之，按社會經濟的觀點，這種古已有之的「糊口觀念」確足以阻礙社會的進步，延緩工業的發展，現在不惟不應加以揄揚，且應把它斷絕。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資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在農業時代，或可如此的自足自給，以謀溫飽，但是在這個科學技術發達而人口衆多的時代，便不能以這個溫飽主義或糊口觀念為目標了。如若讓這種觀念流傳下去，芸芸衆生將永遠停滯於狹隘的生活圈中，悵望於飢餓的邊緣之上。所以今後社會建設的目標，要破除這種小農經濟的體制及可憐的糊口觀念或溫飽主義，引導全國國民進到現代化的生活園地，使其衣食住行都得到豐富的享受。

根據上面的幾個理由，我們對於羅素讚美中國人「貧而能樂，窮而能守」的意思，只可表示心感而不可引以自豪。否則，便足以形成工業化進程中思想上的雲翳，阻滯現代化的社會建設。

還有一種工業化進程中思想上的雲翳，那就是山林文化或農業社會的懷念。

經濟學者桑巴特於研究西洋工業化的社會以後，強調農村生活的自然樂趣，尤足以誘惑人心，「人類於其過程中（指工業社會），日益與自然隔絕，都市人再不能瞭解自然所給予牧童們萬千的迷戀。他們不諦聽鳥兒的清歌，他們不仰望行雲的飄渺，至於春雷夏雨，晨霧晚霞，他們更無欣賞的閒情逸致了。……一切新的集會結社，都感覺不到鄉村和諧的意味，與家庭溫馨的情緒，而彼此之間如孤獨的石子與冷漠的散沙而已。」由於桑氏回味過去的懷

憬以及思想上的苦悶，遂對於工業社會的生活，提供了「失神化，實物化，等一化」的三大缺陷。

如此慨嘆的話，是吃了過飽而得了胃病所發出的呻吟之聲。因為德國工業化的結果，大家的物質生活，業已飽嘗，都市生活，行將厭倦，自然對於那黝黑的烟囱，及嘈雜的馬達，發生反感，而懷念過去農業時代的自然樂趣。中國連工業化的味道，尙未淺嘗，那有資格作這種裝腔作勢的嘆息，與田園詩人似的懷念。假若有之，豈不是無病而呻吟，徒受外人的譏笑麼？

再從社會學的見地研究起來，現代是「城市支配了鄉村，工業支配了農業」，若仍留戀鄉村社會，農業經濟，恐永遠成爲被支配者而已。日本人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其用意所在，無非企圖中國人永遠羈留在被支配的陷阱裏面。僅由這個觀點，便足以策勵我們，必須迎頭趕上，以脫離農業社會的桎梏。

還有一種思想上的雲翳，也可以妨礙我們工業建設的，便是一部份西洋人認爲中國走上了工業建設這條路上，大有變爲帝國主義威脅世界和平之可能。茲先引英國學者烏爾弗(Ulford Woolf)在「帝國主義與文化」一書中的導言，說明帝國主義與工業組織的關係。他說：「這個由產業革命所發生的新西歐文化有一個特質，就是在歐洲以外完全是掠奪的。就經濟方面說，必須多數市場與大宗原料。產業愈工業化，則開拓新市場與新原料來源愈爲必須。因此發生了對於亞洲非洲澳洲與南美洲的經濟侵略。這便是在各洲民族感覺新文化壓迫力的第一方法。臨於亞洲與非洲方面的這種壓迫且有特別形式，使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迥異於前世紀之政治侵略或文化競爭，因交通運輸上機器之發明，給歐洲人以絕大權力使能開拓遠方土地以達其工商業之目的。至如工業機器之發明與新式工業之興起，則已完全變動了世界自然力的均衡(Balance of Physical Power in the world)在十九世紀以前，各大陸文化平行發展，此一文化並無壓服彼一文化之優勢。……所謂「近代國家內新式工業之有組織的權力」(The organized Power of modern industry in a modern state)一語，實足顯明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與歐洲對世界關係上之另一特質。在由產業革命所發生，

並由盲目經濟勢力所引誘，以謀操縱亞非兩洲市場與出產之製造家，商業和資本家的背後，便站立了一個由法國革命與拿破崙戰爭所產生之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的近代國家。這種國家的政府權利，常有意或無意的，直接或間接的被其資本家利用以侵略其他洲的民族，而達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這事實極爲顯著，其影響至足驚異。曾有一次迅速而極兇惡之世界征服，爲人類歷史上所罕見者，在一八一五與一九一四年間，亞洲非洲與澳洲幾全部皆直接或間接屈服於歐洲國家威力之下。」

因爲新式工業組織與帝國主義有如此的深切關係，所謂美國現實主義的人士便以爲中國如果工業建設成功，以中國人口之多，毅力之強，必然會變成帝國主義，或者比過去的帝國主義更利害些。如耶魯大學斯拜克曼(Spaulding)在他討論美國戰後外交策略中，很明顯的表示這種見解。他認爲：「中國以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國，一旦工業化起來，而沒有日本來牽制它，必能比西洋的任何國家，尤爲可畏。」由於這個錯覺，他創立了「新均勢主義」以阻止中國強大以後，變爲新興的帝國主義。

卽對世界局勢代表開明見解的比斐(Peter)在「未來之中國」一文中所謂「中國之強大假若對列強爲有利，則應趕快幫助中國使之工業化。」還是持一種「假定」的語氣，表示出來中國工業化的結果，「容或」有不利於世界和平的地方。

這些疑慮，可以中國過去立國的精神以及將來建國的理想去解釋的。中國數千年來嘗以兵凶戰危，自行警惕，非至迫不得已，絕不肯發動戰爭。羅素云：「世界上有『不屑戰爭』(Too proud to fight)的國家麼？那就是中國。中國人的天然態度爲寬厚友愛，禮尚往來。」這幾句話，確可以說明中國能以和平爲處世之本。

這種和平的風度，係由遠古以來聖哲學說的薰陶以及歷史之流的遺傳，日久蓄積而形成的。如中國政治哲學的「尚書」所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如政治史評的「左傳」所謂「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師直爲壯，曲爲老，」無不是發揮和平的精神。至於消極主義的哲學家老子所謂「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當然以和平為理想；即積極主義的哲學家孔子，也是同樣的主張「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的忠恕之道，以達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這種數千年來流傳下來的處世哲學及世界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久而彌堅。國父擷取這種優點，所以在民族主義一講中諄諄告誡云：「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大道德……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種和平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在民族主義一講的結論中，他說的更為深刻：「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

統而言之，無論就中國的民族道德，以及國父遺教所定的建國理想，都足以證明中國工業建設成功以後，絕不至於變為帝國主義，危害世界的和平。

有這種心理上疑慮的人，稍微對於上面所說的幾點，加以考察，總可以釋然於懷了。

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歐美協助之處甚多，所以我們必須消除他們這種不必要的疑慮，以免形成意外的隔膜或心理上的晦塞。

第十節 由地主商人產業家論中國工業建設之困境

一、「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常是三位一體

二、土地資本轉化為商業資本；商業資本又轉化為土地資本——中國在這循環中不易完成工業上的革命

三、現在中國的產業家往往仍徘徊于地主與商之間

在中國變動的洪流中，地主，商人，產業家（有企業精神的工業家），以如何的姿態與關係出現於吾人之前，我們不可不加以分析診察以透視今後工業建設的陰影。

地主希望在寂靜的農林裏，建設他的樂園；商人希望在熱鬧的市場裏，實現其黃金色的美夢；產業家希望在機械的工廠裏，表演那最緊張的劇幕。

地主的生命線在土地上，商人的生命線在商品上，產業家的生命線在機械上，所以地主宛如植物黏着於土地的執固，商人好像商品價格在交換過程上的滑轉狡變，產業家則如機械活動的迅速準確。

地主與商人雖性格上有質量之不同，但是對於生產本身的阻滯，是一樣的。即地主從生產的邊緣上望望然而去之，享受他的清福；商人在生產的邊緣外，游來游去，滿載而歸；不僅不知促進生產的發達，反而有時妨止生產的進步。真正能促進生產的發達使社會轉變為另一種的類型者，在西洋或許地主與商人有點順水推舟之力，而在中國則不可作如此的單思奢望。

產業家因為處在技術日新月異的行程中，沈入競爭劇烈的浪潮中，必然的採取經濟上的「合理主義」，企圖以新的技術組織，求得致勝的戰果。這種技術上，組織上的「合理主義」便是促進生產，轉變社會的動力。

地主生存棲息於血緣地緣的夾縫裏，以回味過去，凝望自然為樂事；所知者，不過是祖先的遺事；所識者，不過是鄰里鄉黨之人；所見者，不過是數十里數百里之間。商人呢，跋峻嶺，走江湖，周知各地風土人情，交游列國各色人等，其社會關係的橫面當然比地主廣闊多了。至於產業家呢，無論天上人間，陸地海洋，無不有他的蹤影，無不有他的企業精神，不惟橫面的關係較為廣闊，即縱面的流動亦更為深刻。

由社會的橫面關係，縱面流動，以及基於這種關係與流動所引起的文化傳播與社會變遷看起來，則商人實比地主進步，產業家又比商人進步。

然而這種進步是有限制的，並且在某種場合上，地主商人有合流之處；商人與產業家亦有合流之處；地主商人，產業家，雖不能完全合流，構成一個線面，但在某一點上，確有相同的意識。

地主與商人在什麼地方合流呢？

地主以其過剩的土地收益，或變作高利貸或投資於商業，希圖利金所得比土地收益更為迅速。商人利用商品買賣的價別所獲取的富力，為求安全有利起見，必然的購買土地，放款生息，變為地主及高利貸者，所以經濟學者往往把「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看作「三位一體」，這在社會史上是很有根據的。尤其是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對於生產農民的蠶食鯨吞，是一致的。

還有，地主的生活在求「自足」，所收的地租以實物為主，這種「自然經濟」的形態，足以表示地主們的自得。與封建商人在商品的交換過程中，渡其動盪的生活，本來脫離了自然經濟的藩籬，而躍入於貨幣經濟的大海，可是商人以其貨幣轉入於地價之中，變為大地主以後，又由交換的貨幣經濟，退伍到自足的自然經濟了。

商人的不長進在此，商人資本（包括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發達不能直接促成社會生產的前進亦在此。商人與產業家的合流地方在那裏呢？

這在「意識之流」的方面，是頗有氣味相投的地方。如桑巴特所描繪的商人意識，實在也就是產業家的意識。他說：「我瞭解商人精神是那一種精神，是那一種宇宙觀。它迎着生命問：你這生命能給予我什麼，它把個人在塵世上的整個生存當做商務的總和看待，個人對於命運，或上帝，個人或全體，到處要講「生意經」，求其自己獲得最可能的利益。」

不僅只在利己主義的意識上，商人與產業家有相同之點，即地主也與之有相似之處。不過地主的利己，是在靜觀自得的生活，望其實現；商人是在操奇計贏的銅臭中，達其目的；產業家是在現代企業的繁複組織中，求其勝利。

地主，商人，產業家，有其類同的「共相」，亦有其各別的「個性」，並且「共相」的成分少，而個性的差異大。由這三者個性的差異，以及對於社會變動的影響看起來，則地主轉化為商人，商人轉化為產業家，可以算是一種順應的程序。

在西洋社會，這種順應的程序，是有其水到渠成，花開果熟的樣子。而在中國呢，地主與商人始終徘徊不前，未能躍進到產業家的地位，即偶而躍進，有時又逆轉過來，終逃不出循環矛盾的圈套。

自原始社會破滅，性的分業進化到雛形的社會分業，於是形形色色的農業品，手工業品刺激人們的慾望，產生了贈與交易，物物交易，或自然貨幣的交易，這便是「交換經濟」成立的因素。自土地私有制與奴隸制完全成立，剩餘生產物的自由買賣更為頻繁，遂使「商業經濟」植下了深根，露出來枝幹。最後，奴隸制度盛行以至於轉化，所謂貢賦或田租，豐富了商人的原始蓄積，開拓了商人的前進道路。他順着這一條道路，經過歷史上多少的消長盈虛，一直活躍到現在，仍然與社會經濟結不解之緣。達布羅斯克(Darbrowsky)謂：「商業資本不只是專門與某一生產方式發生關係，可以與奴隸生產制發生關係，更可以與大商品生產制發生關係，所以商人好像是生存於生產的毛孔中，如快樂之神生存於宇宙間一樣」。

商人利用過去各種生產制度的結果，不僅只兼併農人，管制手工業者，有時也交結權要，傾動政局。如司馬遷在貨殖列傳序上云：「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如食貨志所載晁錯的沈痛之言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運，操奇計贏，日游都市；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

地主們看見豪商巨賈在經濟上頤指氣使，在政治上勢傾朝野，當然羨慕之心油然而興，也以其地產的蓄積，經營商業，使土地資本轉化為商業資本。

豪商，巨賈們發了橫財以後，以其衣錦還鄉的心理，及託付土地的安全觀念，反而使商業資本轉化為土地資本。

這樣的反復循環，只有農村分解，手工業者受氣，而在主觀上，客觀上，對於進步的經濟制度均沒有什麼裨益。

到了近代，我國與西洋工業發生了密切關係以來，本應由商業資本進步到產業資本，使新式工業居於領導商業的地位，但是因為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性與壟斷性，只能在它的羽翼之下，限制之中，使我們的商業得點畸形發展，以便推銷它的工業品，所以百年來中國的新式工業，仍不能抬頭。

抗戰以來，由於經濟區域的差異，市場紐帶的鬆懈，物資的缺乏，交通的阻滯，遂予商人以破壞「價值法則」的黃金機會，使物價風起雲湧似的暴漲起來，洪水氾濫似的害及國家。這個洪水的洶湧，近則變本加厲，鼓動各種樣的人們，都以經商為樂事，無論形上形下，莫不洋溢著「生意經」的氣味，匯成了極端利己的社會風氣。

這般大小商人賺了大錢，更燃起「地產安全」的老觀念，向地價方面大舉進攻，於是商業資本，重溫歷史的故事，又轉化為土地資本。

現當工業化運動亟須開展的時間，在政府方面：第一、對於土地政策的實施，對於地主商人的嚴格管制，要雙管齊下，不可像現在為土地資本留一漏洞；第二、要實施計劃經濟使工業有長足發展的機會。第三、產業家要有國家思想，社會觀念，不完全站在利己的企圖上，也是在新中國建設中應有的精神。

第十一節 由企業精神論中國工業建設之難境

一、西洋企業精神之特質與起源

二、企業精神在中國難產之原因

三、將來企業精神之轉化

何謂企業家？有沛然莫之能禦的「企業精神」，方足以稱為企業家。但是如此時代如此中國的企業家，縱其根本精神，與近代西洋的企業家大致相似，而其活動的路線，却有不同。

經濟學者桑巴特所描繪近代西洋的企業精神是這樣的：

「企業家是征服世界的人，是活潑潑的人，不是靜觀者，不是享樂者，不是出世者，不是否定現實者。這是一種勇武的精神，這是一種不安靜的，不疲倦的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深入到一切方面；即在宗教上從事解放，在科學上從事闡揚，在技術上從事發明，在世界上從事發現。這同一精神，更打破了那種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封建手工業的藩籬，將世人驅入營利主義的深淵中。」桑氏對於企業精神的描繪，固然有所烘托強調，可是就大體上看，是抓着了它的輪廓。

這股精神，發自歐洲，浸及世界，所以能支配一百五六十餘年之久而不衰歇，並非一朝一夕之力，乃是由於「西洋歷史的深處」，相激相盪，形成出來的。

這個歷史的深處，源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人之發現」與「世界之發現」使人們的個性光復，面臨自然。繼而宗教改革，使人們的信心得以解救，與上帝境界發生獨往獨來的直接關係。最後，法國革命更如火山爆發似的激動人心，予中等階層以「市民的精神」及「天賦的人權」。

自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這幾個劃時代的運動都是構成企業精神的歷史因緣與思想背景。至於陸克（Locke）於十八世紀初葉把證券投機與哲學觀念在心理的感覺上融會一起，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一七七六年由他的「原富」宣佈了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由他的「物種原始」揭穿了動物與人類的生之祕密，在自然競爭，天然淘汰，……把企業精神的理論根據奠下以後，尤足以鼓勵企業家們理直氣壯的向前。

還有，英國於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由近代歷史的界石，所謂工業革命，踏上了新的途程。繼而法國於一八三〇年，美國於一八五〇年，俄國於一八六〇年，德國於一八七〇年，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又使企業精神於理論根據之外獲得「技術的法寶」，那自然顯出不可勒止的狂奔之勢了。

西洋的企業精神之起源與進展，既是如此的「順風而呼，聲非加急，其勢激也，」所以吹遍了天之涯地之角，儼然成爲一代的風尚。

近代中國的企業精神，從先天方面說，缺少這種有本有源的歷史因緣，理論根據，以及日新月異的技術法寶，而且外受帝國主義的鯨吞，內受封建勢力的侵蝕，真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注定了坎坷命運。

抗戰以前，有人們不惜低首下心，乞乞覓覓，向帝國主義者求情乞助，那也不過只得點唾餘殘羹，依然難有大吉大利的運轉。比如第一次歐戰方殷，這個壓力稍微輕鬆一些，他們忽而走了小小好運，等戰事一過，這點好運又成爲過眼雲烟了。

中國大多數的企業家便在這種穿道夾縫之中，過了數十年的坎坷生活而不自覺。

有人謂「現在不平等條約業已取消，抗戰勝利後，中國新式工業當可自由發達，而企業精神亦因之有所憑藉，得以運用自如」。但是我以爲不平等條約取消以後，雖對於工業上有些好處，但是我們的經濟實力，一時尚難比上歐美，爭取平等，獲得完全自由發展的資格。因爲戰後各國的屯併(Dumping)科打(Prota)制度，關稅優勢。不見得迅即裁廢，予落後國家的工業以保護的機會。所以企業家們仍不可不以戒慎的，集體的，與民族同利的新觀念，渡其來日的坎坷，求得事業的成功。

西洋的企業家，「自始」即係憑其永久不疲的毅力，精密的規劃，再加上新奇的科學技術，才能有所成就。他們在過去的順勢中，尙且如此，我們在坎坷中，豈不是更應如此。然而現在有些以建設工業名的人們，只知靜悄悄的囤集原料成品，圖一時之利，竟讓機器技術在那裏沉默腐蝕，這簡直成爲民族的罪人，工業中的害羣之馬！

尤其是組織的精神。今後中國企業家們更應特別注意，以便通過組織，發揮機器技術的作用。桑巴特云：「誰要想組織，第一必須具備評判人們服務能力的才能，必須由大羣的人中，找出那些適宜於一定目的的幹材，使因其同活動而聯合的人們，得組織成一個富於服務能力的整體。」而中國有些工廠，或其他企業組織，往往首腦人物把

第四章 中國工業化的條件及途徑

第十二節 工業建設的先決條件

- 一、中國工業建設的先決條件：甲、國際間的和平局面 乙、國內的統一安定 丙、民主政治的實施
- 二、蘇聯自一九二八年為推行五年工業計劃即採取多邊的和平外交政策
- 三、國內如不統一安定，則工業建設絕難得到國外的援助
- 四、英法美等國都是先實施民主政治而後才有工業革命的成功
- 五、中國如實行民主政治，即可消除歐美人士疑慮中國工業建設成功後有威脅世界和平之可能

中國戰後的工業建設，至少須有三個先決條件。這三大條件的第一項，便是國際間的長期和平。

「世界是整體的」，現在已成爲人類共認的真理了。這個真理在原始社會時不會存在，在近代的初期雖已存在，但並未爲人類深切的認識，遂致於遺誤了許多大事。

原始社會時，每個人羣體(Tribe)約有幾十個人，並且這個羣體與那個羣體之間往往老死不相往來。而現代呢，因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全世界十八萬萬人類，都發生相互的密切關係，形成了空前的國際社會。一九二九年美國經濟恐慌的洶湧，能波及各國，引起全世界的不安；「一九一八事變」如野火燎原，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都是最顯著的例證，足以使我們知所警悟。

「天涯若比鄰，世界爲一家」本在十九世紀即已形成，可是因爲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以及部落克(Tribe)的經濟思想，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孤立主義的政治思想，從中作梗，遂致隔岸觀火，無休戚與共的誠意。到了這一次大戰倏然爆發，將全世界幾十個國家捲入戰爭的火海，大家才恍然於過去的錯誤與失敗。現在大家正根據這一

次的教訓，積極謀全面的國際合作，以制止戰爭之復發。將來無論效果如何，我想着總比上次大戰以後的局面進步些。

中國在戰後和平的策劃推進之中，當然也衷心求其實現，使世界成爲休戚相關的整體。我們這個衷心的願望，至少有三個理由：第一，中國自古以來，本是以和平爲立國之本。這次對日抗戰，全由於勢逼處此，不得不起而自衛，而其目的還是爲保持東亞以及世界的和平。所以凡關於世界和平的大計，中國無不熱誠參加，以襄盛舉。第二、中國經這次長久的大戰，其破壞之廣，死傷之重，恐佔世界第一。及戰事結束，這種復興的艱巨工作，自非短時所能完成。第三，中國是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其希望建設成功的熱切，恐在各國之上；第一第二個理由，不僅只中國如此，其他盟國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第三個理由，更是中國希望和平的最大根據。

這裏所謂和平，包含兩個意義：一是國際間的相互和平，即是國際間要有一個永久的和平局面，或至少有廿年卅年以上的和平局面。二是中國本身要與左鄰右鄰以至於世界各國都做到和平的關係，所謂「協和萬邦」正是戰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準則。若世界擾攘不安，工業國家不能給我們技術上資本上的援助，而想全憑自身力量完成工業建設，不但形勢險惡，不易成功，即偶而成功，那也是漫漫長夜何時旦，有緩不濟急之感。

世界局面在擾攘中，中國的工業建設便受到這樣的妨礙，若中國本身因爲外交政策的錯誤而引起對外的齟齬，其影響所及恐更嚴重。世界整個局面的推演，中國一個國家，似乎很難有主動的資格；至於中國對外的相處，我們儘有自主運用的能力，所以這兩點意義之中，以本國協和萬邦的外交政策，尤爲要緊。

當蘇聯於一九二九年以後，舉國推行五年工業計劃的時期，對於國外的態度與政策，很可以作爲我們戰後工業建設的參考。蘇聯最初主張非繼續不斷的革命與世界全面的革命，絕難保障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但自一九二九年起，忽將世界革命的方略改爲「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政策」，表示協調各國以求和平。這願望經李維諾夫四五年的

努力，成績昭著：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一九三五年成立法蘇互助公約，一九三六年成立英蘇借款條約；一九三三年與美國恢復邦交，一九三二年與中國恢復邦交，並與波蘭捷克、波斯、芬蘭、阿富汗、土爾其、立陶宛、南斯拉夫、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簽訂多邊安全公約，一九三六年蘇聯通過新憲法，更想以這個民主制度博得民主國家的同情。蘇聯致力於這樣多邊的和平外交，它的三個五年工業計劃，才能夠安心進行，免受國外的牽制。由此看來，自一九二八年以後，蘇聯最大的成功，便是一面對外和平，一面對內建設——這兩大動力如鳥之雙翼，倏然於短時之內飛躍到獨立自由的天空，使世界為之刮目相待。

工業建設的第二個先決條件為國內的統一。上面所說的條件，是關於國外方面的因素。這個因素，有時受狂風驟雨的影響未能自主，當然情有可原。至於國內呢，若自行擾亂而不能統一安定，那國際就要冷眼鄙視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不援助中國，我們也無怨天尤人的理由。因為國外的投資，是希求「安全」的。如若我們國內的政局動盪，秩序不安，他們何敢以有用的金錢或器材，投到我們的國土之內，作白白的犧牲呢。

再退一步言之，這種情形之下，不但外國不願投資，即本國人也不願投資，不惟本國人不願投資，即政府也無法從事建設；所以國內的統一與安定，為工業建設的先決條件，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是如此的。

這裏所謂統一，不僅只指政治上的統一，凡關於國語的統一，交通的統一，稅務的統一，度量衡的統一，無不包括在內。德國的工業革命所以比英法遲遲誕生的原因，便是因為當時統一條件太不完備。這種情形，德國經濟學者李士特（Lieser）有幾句扼要的敘述：「德國四十八道的稅關線和入市線，使國內交通癱瘓。它所引起的嚴重影響，正好像人體全身子以束縛，因而血液不能暢流到別一部分一樣。」德國自一八〇六年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即陷於分裂的局面。到了一八一三年——一八一九年的解放戰爭，一八三四年的關稅同盟，才走向統一的道路。最後於一八六〇年前後，出了多策乞克（Von Treitschke）與俾士麥（Otto E.L. Von Bismarck）兩大人物，一個從理論方面鼓吹統

一、一個從實際方面推行統一，於是德意志的封建局面，經六十五年的鑄造，才建立大一統的規模。姑無論這種統一，是垂直性的，或是俾士麥式的，而其對於一八七〇年以後的工業革命，確是大有幫助的。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以後，各州統一為整個的國體，才有經濟上的工業革命及西漸運動；蘇聯自大革命至一九二八年，將社會秩序調整妥當，才發動五年計劃，也足以說明統一與安定為工業建設的先決條件。

中國經北伐的革命運動及這次的對日抗戰，實際已臻於統一的局面。只以對外關係與對內處理還需盡最善的努力，是以國外人士不無抱疑懼的觀念。我國應以事實消除這種疑懼，然後才能得到歐美技術與資金的援助。美國副總統華萊士(Wallace)於一九四四年七月由我國返美之後，在其廣播演辭中曾明白道出這個內心的衷曲。他說：『中國亟盼進入機器時代，然現代作戰物資或重工業品之生產，僅佔其所需之一小部分。此種形勢不應令其繼續存在。擁有四萬五千萬人口與豐富資源之中國，遲早應生產其所需重工業品與消費品之大部。然中國欲其工業近代化，欲訓練其人民，即須獲得協助。吾美之技術人員與商人有力作此項協助者，數以千計。然商人有一事不能確定：即彼等在奠立基礎並籌劃其必要經費時，先欲確定中國內部或中蘇間不至發生爭論。』

工業建設的第三個先決條件為民主政治。一七八九年後的法國革命與一七七四年開始的美國革命，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父母。一七九一年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man)第一條云：『人生而平等，人的權利也應該平等。』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說：『我們相信人類是生而平等的。』這兩個宣言，遂使民主政治成為洶湧的潮流，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嚮往崇拜。

從社會經濟方面看，民主政治的崛起，是由於工商經濟國民經濟的發達。在中古農業地方經濟時代，封建領主各霸一方，企圖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造成一個瓜分似的藩邦。像這樣子的局面，一定是苛捐雜稅層出不窮，關卡

林立，妨礙交易，甚至於烽火時起，戰攻不息，弄得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十七世紀以來，工商漸漸發達，於是不能不打破這種封建的局面，以求和平自由社會之實現。因為只有這樣的社會，一般人民才能安然的作生產交易的工商活動。

根據這個理由，就可以說明在近代各國工業革命的黎明期，多半要經過民主政治的醞釀。如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固然因素甚多，而在工業革命之先的民主政治運動當然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John 1199—1216）為徵收苛稅，受貴族之反抗，不得不簽定大憲章（Great Charter）以規定徵稅及捕人的法定手續。繼而幾經變革，於一六二八年國會強迫查理第一（Charles I. 1623—1649）允許權利請願（Petition of right），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之後，國會又制定權利法典（Bill of right）及王位繼承法（Act of Settlement），於是英國的憲政基礎，從此確立。英國國會經這樣長久的奮鬥，才取得了「徵稅同意權，預算議決權及立法權」等等，以保障人民的經濟自由與參政權利。十七世紀既有這樣波瀾迭起的民主運動，並且奮鬥出來這樣的成果，這就於無形中給許多人民增加了與奮劑與生活力，使十八世紀的貿易與發明，都得到滋生長育的機會。

此外，美國一七八七年所奠基的憲政，對於一八五〇年前後的美國工業革命；法國於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九年的政治解放，對於一八三〇年左右的法國工業革命，都可以用上面的道理說明「民主與工業」的密切關係。

姑無論這種民主，有認為是市民式的，或布爾喬亞式的，而其對於工業革新的進展，有開路清道之力，確是不能否認的。

x

x

x

十八九世紀的民主，在當時確是由許多人的血汗換得來的，而在現代看起來，也有破綻之處——即是僅有「政治的自由」而無「經濟的自由」。所以廿世紀的民主，特別注意經濟的自由，使國民不僅只有參政的權利，並有「生活的權利」。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德國所公佈的威瑪憲法因為特別發揚「社會主權」的特徵，世人有「經濟的

憲法」之稱讚。如其中第一六三條規定：「對於德國人民，須給與以機會，使他們得從事經濟勞動，以維持生計，凡不能得到適當的勞動機會者，須給與以必要的生活費。」這一類規定，總比十八九世紀的憲法只規定什麼信仰，言論，居住，遷移……的自由高明多了。蘇聯的新憲法對於經濟的民主尤為精密，如第十二條所云「蘇聯正在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之社會主義的原則」，就可看出其整個精神之所在。這種由政治的民主進到經濟的民主，（統名為民主政治亦可）不但可鼓勵工業上的生產，而且可解決工業上的分配。

總之，無論從工業革命的發動方面說，或工業建設的成果方面說，都需要培養民主政治的力量已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這種事實，由近代革命史的推演，將更有長足的發展。

中國現在想進入機器時代，以圖工業之發展，當然要認清這個歷史的事實，使民主與工業攜手並行進入現代化的地步。中國在工業建設的過程中應該推行民主政治，除了前面所說的理由之外，還有國際關係上的理由，亦不能不略爲提及。

中國的工業建設需要歐美幫助之處甚多。現代有些歐美人士認爲中國如果不實行民主政治，則推演所及，恐將變爲帝國主義，小則妨礙國際間的通商貿易，大則威脅世界的永久和平。他們的心目中既常有這種疑慮，那還有幫助我們的熱誠呢？如克伯遜 (Ely Culbertson) 於一九三四年在「爭取此次戰爭勝利和今後世界和平的一個策劃」一文中，就有這樣警惕性的話頭。他說：「現在美國的潛力和實力已達極峯，但是儘管我們能擊潰了目前的敵人，將來我們也要遭逢更大的危險。將來我們和那些未遭戰禍蹂躪而人口稠密的國家相較，我們當形成爲一個弱國。待一兩代以後，中國，印度，回教區將成爲工業國，她們從來沒有機械，自然不能統治世界，但當她們工業發達時，誰能斷定她們工業的動向。」

所謂「工業的動向」，在歐美人士看起來，當然是指的民主政治。因爲在民主政治的運用中，民意輿論的力量

很大，凡國家對外戰爭，一定要受民意及輿論的限制，並經國會的通過，絕不容許一個有權威者或少數有權威者利用工業技術的優越，任意侵略他國。所以在這樣民主或代議制度之下，無論對於大小國家的和平，都容易得到相當的保障。美國胡佛(Herbert Hoover)與吉卜生(Hugh Gibson)於「持久和平問題」一文中，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代議制政府為和平之基礎，百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惟有代議制政府才能使和平之願望充分地發展，然此尚不足以保障『絕對的和平』。有代議制政府的國家並不能避免參加戰爭，甚至參加帝國主義的征服戰爭，不過他們的目的大致是和平的；……所以我們贊同美國在一九一九年說的『和平應建立於培植於代議制政府的工作上』，這是永久和平希望良好的基礎，……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各國必須採取代議制政府才能建立永久的和平。」

「但是僅此一端還不夠，個人自由和代議制政府之產生，均屬微渺。在上次大戰終了時，戰勝國家曾鼓勵此種政府之產生，但在其初生之時，即讓其分裂，有時那些資格較老的代議制政府，事實上在摧毀他們，所以現在我們應當注意：不但要發動代議制政府之產生，並且要在敵國中去慢慢撫養它，使其成長。」

胡古二氏的言論，是頗有遠見的。這次日德意三國所以敢發動侵略戰爭，從政治方面說，實係由於民主的沒落以及代議制度失去了靈魂。假若民主健在，國會有力，何至於讓這些軍閥胡作亂為，把國家作「乾坤之一擲」？戰後，世人痛定思痛，一定決心致力於民主世界之建立，以謀永久和平的實現。

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以民權主義為準則。自 國父倡導革命以來，迭以言論與事實號召國人共同努力。所以今後工業的動向，一定以民主政治為先鋒，期以工業建設的成績，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並維持世界的和平。

第十二節 工業化途徑的論爭

一、工業農業發展的先後問題

二、工業農業的比重問題

三、重工業輕工業發展的先後問題

四、致富圖強的輕重先後問題

五、思想體系的方向問題

民國十年左右，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人受了外交失敗的刺激，有識之士，競以提倡賽因斯相號召。到了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家又由提倡科學的呼聲中，特別注意工業化的建設，可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得到了建國的要領。現在凡稍有眼光之人。當然對於工業化這個大方向，無異議的了；但是工業化應走的途徑，因為中國社會的性質，建國的理想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所以在主觀上仍有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差異。

第一、工業農業發展的先後問題——是先發展工業以引起農業之變革，抑係先發展農業以促進工業之進展？

贊成前一項的，在社會學經濟學的論壇中，為數最多，且佔優勢。贊成第二項的，雖自以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在那裏經之營之，以實驗其理想，但仍是一種「一點的」活動，並無若何大的效力。村治運動的中心理論，似乎極力主張這一類的見解，如梁漱溟先生在「鄉村建設理論提綱」中三番五次的解釋，「中國經濟建設頭一步，當先集中力量解決農業上各問題，……在農業技術前進中，工業自相緣相引而俱來；一般購買力隨生產興盛而抬頭，尤刺激工業之興起。……中國經濟建設，照鄉村建設運動的要求，應採取的方針路線，就是：散漫的農民，經智識分子領導，逐漸聯合起來，為經濟上的自衛與自立，同時從農業引發工業，完成大社會的自給自足，建立社會化的新經濟構造。」

我對於這一類的見解，頗以為舊式農業下的一般農民因限於地域交通及經濟自給的關係，很缺乏組織的性能，若不先從土地問題解決，而只從一點一線的組織入手，再謀農業技術的改良，由農業技術的改良，最後才求工業的發展，別說形隔勢阻，似無辦到之可能，而時間方面，亦大有緩不濟急之感（此意可參閱本書中戰後世界與中國工業建設一節）。況且近代各國工業發展的途徑，莫不先由工業引發農業，中國過去雖係以農業立國，也難逃避這個

發展的程序。所以村治運動好像是一部分智識分子戀慕鄉村自然風味，把這個建設事業當作一種藝術似的製作，慢慢在那裏欣賞，以期待其烏託邦的實現；雖其志可嘉，而其方法未免太迂遠了。

第二、工業農業的比重問題——在現代立國建國的場合中，以農爲本，還是以工爲本，這也有相對的意見。

農本主義者認定中國過去既是以農立國，農業已有很深厚的基礎，那末，今後還應以農爲本，利用農業品的外銷，爭取國際市場的地位，而工業方面，可暫取守勢，徐圖發展。如楊開道先生便是持這種主張的一位。他在「再論中國以何立國」一文中有云：『我認爲未來中國的經濟動態，經濟的特性是「農業攻勢，工業守勢。」我們將來的工業，似應和一般國家一樣，有輕工業，有重工業，有國防工業，可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見長的地方。我們將來的農業，似乎可以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特殊地位，有幾樣或者可以居領袖地位。我們的農業應該採攻勢，我們的工業，應該採守勢。』這一類見解，曾引起工本主義者的反駁，認爲中國農業如不先用工業技術改良它，不惟在世界市場上無立足之地，即連本國亦不能自足。固然農業有幫助工業的地方，可是在這工業的大時代中，還是先有工作的發展，然後農業才有進步的希望。幾千年來，中國農業並無什麼進步，其主要原因即由於工業技術的簡陋，如果將來工業技術大有進步，當然可以使農業也隨之進步。如蘇聯的集體農場，美國的新式農業，那一樣不是利有工業上的技術才有這樣的成績呢。所以從中國的建國方針上說，應該是工比農重——這樣，一則可以使工業迅速的建設完成，而農業亦可以有進展的機運了。否則，就連在國際市場佔有地位的幾樣農業品，也終爲工業國家以技術改良的力量把它們淘汰淨盡，例如中國的絲茶，過去有一個時期因缺乏工業技術的幫助，其命運就一天一天的衰落，得來加以新式技術的改良又漸漸在國際市場上恢復競爭的力量。

再進一步言之，單憑這些農業品，無論如何的加工改良，亦難立足於世界；必須工業建設到了相當程度，堪與列強相比，我們國家才有立足的資格。所以注重工業，以爲建國之本，才合乎現代的局勢。至於農業之當重，以協

助工業的發展，工本主義者並不反對，不過在建國時期所謂重點主義的建設，自應以工爲本，走上現代化的境界。農本主義與工本主義的人士曾於二十九年發動一場小規模的論戰，而大勢所趨，似乎工本主義的方面較爲博得多數人的同情。

第三、重工業與輕工業發展的先後問題——有主張先發展重工業的，亦有主張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發展的。

周憲文先生在「論新工商」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證：「個人曾經爲文反對過那些以農立國的濫調（詳見所編中國不能以農立國論爭，中華書局出版）而認爲立國於今日，非發展工業不可，而猶以重工業爲甚。蘇聯沒有過去的三次五年計劃不會有像今天的戰績，德國沒有過去的四年計劃，希特拉也不會橫行歐陸。沒有重工業，不能建立國防，沒有國防，未可立國，這是再淺顯不過的事實，用不到反覆說明。現代各國「商戰」的方法，雖然微妙而且激烈到不可言狀，但最後畢竟要以由工業所建設的國防力量爲後盾。否則，至多是像猶太人一樣，雖然經商的本領「通天」，但終於不能立國。」

像這一類的見解，有一部分主張重工業與輕工業並重的人士，表示不大贊成。其所持的理由有三：第一、是以爲重工業之發展，有賴於輕工業的幫助。如若不注意輕工業的發展，而專致力於重工業的增產，其結果必定是重工業的產品，沒有出路以至於停頓，如近來後方鋼鐵工廠的關閉，日漸增多，便是由於這個原因。第二、按英國工業發展的程序是由輕工業誘發重工業，中國似亦不能例外。第三、重工業多半關係國防，輕工業多半關係民生二者相須相成，才合乎建國的目的。這三個理由，關於第一項若站在國防的觀點是不正確的；第二項，以蘇聯五年計劃爲例，是不必循英國之路的；第三項，在建國的初期，不必如此，在建國的後期，是應該如此的。

第四、致富圖強的先後問題——從工業建設的目標上說，有主張先致富而後致富的，有主張先致富而後能致富

的，亦有主張二者同時並舉的。國家不先圖強，國防沒有把握，雖富亦無保障，如法蘭西在這次歐戰的結局，使是一個很嚴厲的教訓。但是亦有謂民富而後國強；若全國國民衣食不足，則國防的費用從何籌出，所以戈林號召國民犧牲牛油而造大炮的呼聲，終難維持長久而致最後的勝利。由於上面兩個見解的偏頗，有人便主張中國是個貧窮國家，同時也是個沒有現代國防的國家，今後的工業建設，對於這兩大目標，應兼籌並顧，使國防與民生趨於一致。

第五、思想體系的方向問題——大多數人是贊成民生主義的，亦有極少人贊成資本主義的，更有人主張只要工業能夠建設成功，不必問什麼主義的。

由西洋資本主義的弊害以及國內環境的需要，足以證明中國的工業建設必須遵循民生主義的大道，使工業建設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既可以迎頭趕上西洋工業發展的成績，復可免除西洋資本的弊害，一舉兩得，算是最經濟的辦法。而少數近視的人們，偏以為民生主義過於理想，其中不免有妨礙工業建設的地方，所以主張以自由發展的方式趕上英美。近來，有些主張社會主義者曾以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忽而主張中國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世人受其影響式，亦有資本主義吶喊了。至於富商大賈們為自己目前的營利及將來的前途。當然也擁護資本主義，以為神符。這些的意見，最多只能形成潛意識裏面的暗流，絕不至於有所作為的。因為民生主義業已成為數十年來國民革命的目標的庸俗，且與民衆的福利相符合，何能讓資本主義在社會裏面蓬生蔓長呢。

至於只圖工業建設而不問什麼主義的人，在骨子裏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的。這樣措詞，不過是用化裝的手法，轉移視線，避免社會的指摘而已。看了上面這樣多的爭論以後，真覺得要有一個確定的目標以及達到這個目標應循的途徑，以免一誤再誤我們的工業前途。下面幾節，擬參照學理與事實分別敘述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第十四節 泛論工業化的途徑

一、推行計劃經濟與注重科學研究

二、須於戰後十年二十年之內將重工業建設成功

三、以戰敗國的機器代替賠款

四、大量借用國外的資本與人材

大戰略家克勞塞維茲（Clausewitz）所說的「在空間上集合力量，在時間上集中力量」，同樣的可以應用到中國工業化的建設方面，以免築室道旁，終久無成。這樣「重點主義的建設方針」，我們可以說民生主義是我們工業化的目標，而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至少要做到本節及以後幾節的幾個原則：

一、紐拉斯（Zerubb）及其他許多學者，多謂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是同質的，其實二者有嚴密的區別：即計劃經濟是根據一定的社會理想，謀整個社會的康樂，而統制經濟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臨床救急辦法。分析言之，一為生理的，一為病理的；一為理想主義的，一為現實主義的；一為機械的，一為有機的。所以中國的工業建設，要採行計劃經濟，而不枝枝節節的採行統制經濟，其理由完全在此。

根據這些原則，我們的工業建設，應該先遵照「實業計劃」以及現在的客觀條件，規定出來十年或二十年的完整計劃。這個偉大計劃的特質，如整個人體生理的構造——全體與部分相適應，體內與體外相適應，然到先能自立自強而後享受康樂的幸福；並且在實施時，可以仿照人體發育成長的原理，由部分的經濟計劃推行到全部的計劃經濟，由幼稚期的經濟計劃，推行到成熟期的計劃經濟，不要希望各部分結構一齊成熟，更不要希望整個社會一步升天。

按照這個途徑，第一、先將與經濟命脈特別有關係的鑛產、交通、銀行及其他公用事業，對外的重要貿易，統歸國有國營。第二、凡係重工業雖不必完全國有國營，但須依照國家整個的計劃，才准私營。第三、輕工業讓人民自行經營，可是須與國家的經濟計劃相配合。第四、管理市場上的自由競爭，以免景氣之循環。第五、管理個人的

口由消費使納入於合理的分配。第六、對於私人財富之腫脹予以適當的調治。到了這些條件俱備以後，才算是有了計劃經濟的雛形。有了這個雛形，再加以悉心的養育，才可以發展到成熟時期。

不過社會的構造，畢竟與人體不同，所以實施計劃經濟時，既非恰如人體發育那樣固定的分期，當然可以一步作兩步三步走，也可以一步分作兩步三步走的。

x

x

x

二、羅素有幾句話批評中國人，雖說不完全正確，但是頗可以刺激我們反躬自省。他說：『中國人的目的在享又，而西洋人的目的在權利，故西洋人好以己力勝人，更好以人力克服自然，於是創為科學。中國人的天性既偏愛逸樂，……故不宜於創造科學。中國人不好活動，必待有實利的目的，才有意為之。中國文化有此缺陷，當然沒有抵抗強鄰的充足力量。』我們對於這幾句評語，也不必斤斤辯論孰是孰非，我們本着虛心若谷的態度，要下個極大的決心，努力推進科學，使落後的中國，迎頭趕上西洋。

說起科學研究，國人嘗以已有某種科學自詡自豪。如莊子說的「徑寸之槌，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與方程論似有吻合之處；段西陽知道「鷹色隨樹蛇色隨地」與保護色學說似有類似之處，以及蚩尤作大霧，黃帝作指南針，商代製銅，周代冶鐵，漢代燃煤造紙……便以為中國有了很發達的科學創造，這未免太自負了。自負不應該，自卑亦不應該。我們由這些例證可以自信的說，中國人並非無科學天才，只要努力研究，燃起創造發明的熱誠，也能夠大有建樹，促進工業化的成功。」

在工業化的初期，一般人或許認為實用科學之研究較為重要；但是為求工業的永遠進步起見，則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應同等看待，或者純粹科學比實用科學更重要些。因為實用科學的創造無不是由純粹科學產生出來的，若純粹科學不甚發達，而全憑實際的技術經驗，從事創建，也不過只能應付一時而已。所以今後大學教育以及選送國外留學生的政策，在最近幾年內，為配合戰後的工業建設，自應於實用科學的方面多為偏重；過了這幾年以後，就應

對於這兩方面採同一的步驟了。

三、工業革命發動較遲的國家，因為善於運用先進國技術上的發明，省去了「摸索」這段不經濟的歷程，其完成的時間，比較迅速。這一點，足以激勵我們在短時間內，能夠完成工業革命的使命的。中國早期的工業革命早已失敗，不必再說，今後是我們工業革命的最後時機，我們應拿出革命精神，從重工業作起，於戰後十年廿年之內，建設成功。

工業先進的國家，有的先從輕工業開始，也有從輕重工業同時開始的。按自然發展的程序，往往是從輕工業進步到重工業；可是按計劃經濟來說，就應先把握着重工業，再向四面發展，才算合適。因為重工業為工業之關鍵(Key Industry)，這個關鍵把握不住，本國的工業永無自立的希望。中國工業的成份，據實業部於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的工廠登記，輕工業（紡織與食用工業）幾佔一半（即百分之四八·七六），而機器，水電，冶煉，電氣，軍械五項重工業竟不及五分之一，如此本末倒置，確是本國工業上的一大漏洞。

四、封建式社會的關係為工業革命的難關。如政治勢力的割據，土地資本的繁殖，封建意識的硬化，交通條件的蔽塞，稅務關卡的林立，無不是其中的難關。這些難關的打開，第一、中央政府須以現代的事業精神統籌全局發揮效能；第二、需要以大量的人力財力修建鐵道。全國鐵道網的計劃一旦完成，那些土地資本，封建意識……隨着新的交通條件，或轉變其作用，或清算其命運，則工業上的發展，便不受其牽累了。

根據一九三三年鐵道部的統計，中國平均每百萬人有一千公里的鐵道，每一千方公里的面積，有鐵道六公里——新式交通如此落後，無怪乎有些封建因素，尙未能清除淨盡。近聞戰後鐵道建設計劃業已擬定，決於十年內完成二萬公里，由內線中心向外線輻射，如西寧，寧夏，迪化，包頭，康定等地，都在內線與外線聯繫之列。這對於全國

的工業革命，實在有莫大的助力。

五、我們並不歌頌戰爭，而戰爭對於工業革命有促進的作用，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如美國的獨立戰爭及富有社會改革意義的南北戰爭，日本對中俄兩次的海上戰爭，普魯士對法蘭西的陸上戰爭，對於美日德的工業莫不有很大的利益。

我們看德日兩國由過去戰爭勝利的結果，引起工業革命的激進，很可以作為我們這次大戰的興奮劑。德國在近代之前，原始的蓄積，本來是不多的。因國內小國分立，政治動盪，商業受了很多的妨礙，這種少量的蓄積，也不易變為資本。又因國外貿易，沒有力量發展，更難吸收新資本的湧進。這種情形，自從德國對外戰爭勝利得到賠款以後，就進步了。清末，日本戰勝中國，訂立馬關條約，得到二萬萬兩賠款，及經營工商的利益，於它的工業發展，也與德國戰勝一樣，是頗有直接影響的。中國這一次戰爭的勝利，若為工業方面打算，最好把戰敗國的重要機器交給我們，以之代替金錢式的賠款。因為國父說過：「商業時代的資本是金錢；工業時代的資本是機器」。現在是大工業時代，而中國又需要機器，極為迫切，所以我們應該以機器代替賠款。上次，我們對日戰爭的敗北，使我們工業革命的嫩芽，受了莫大的摧殘，這次我們可要因戰爭的勝利，使其發育成長開花結果了。

六、我們的工業建設，資本與人材方面誠然有借助外國的地方；攷之工業先進國的史蹟，既是如此，證以現在中國資本人才的缺乏，亦不得不如此。但是我們要注意：我們大量借用外國的資本與人材，並非大權旁落，失去自主，乃是一切政治經濟的主權仍然操之在我，這樣建設成功以後，才永遠屬於我們，為我們所享受。換言之，在工業建設的進程中，對於本國的固有文化既不可「自負」，而對於國外的人與物，亦不可存「洋奴的」或「買辦的」心理。

第十五節 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問題

一、大的組織與新的技術之關係

二、託拉斯卡特爾康采倫的性質

三、現在中國工業組織的成分

四、大規模的工業組織與民生主義

五、民營工業儘可積極發展的理由

大規模的組織與新式的技術，如鳥之雙翼，相輔而行，已成爲現代工業建設的原則。十八世紀以後，一經有新式技術的發明，便由家庭工業進到工廠工業，其理由完全在此。自工廠制度成立，家庭在工業上的生產機能忽然失去，家庭的分子遂受工廠的吸引逐漸分散，所以工業向「大」的方面發展，家庭就得向「小」的方面緊縮了。工業愈發展，不但家庭變動，就連那小規模的工廠也維持不住了。

由此看來，西洋近代工業組織進展的經過，先是小規模的工廠紛紛成立，使家庭工業失去原有的地位；後來大規模的工業，風起雲湧，小規模的工廠或受技術的淘汰，或被大企業的兼併，更演成競爭劇烈的局面。這個局面推演所及，所謂託拉斯，卡特爾，康采倫便乘機興起，如大兵團似的互相對壘。

企業的兼併或集中，大概可以分成爲兩類：第一爲組織鬆懈的「利益協定」，如卡特爾 (Kartell, Cartel)，新狄加 (Syndicate) 是也，凡加入這個協定的，不過是遵照契約上的規定事項共同行動，而原有的獨立性格，並未喪失，好像是國與國雖在軍事上結成攻守同盟，而在主權上，都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第二類爲組織嚴密的「企業合併」，如託拉斯 (Trust)，康采倫 (Konzern) 是也。凡參加這一類組織者，原有的單位一律解散，另成一個更大的企業組合，好像是幾個小國合併爲一個大國以後，各自的獨立性便失去了。

無論是「利益協定」，或「企業合併」，只經營同類的產業，通稱爲「水平的結合」 (Horizontal Combination) 或「同類的結合」，否則，便稱爲垂直的結合 (Vertical Combination) 或「異類的結合」。後者比前者更爲深入更爲利

害，石濱知行有云，「獨佔體制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前，只是初露萌芽，至於大的發展，還是在一千八百八十年以後。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年代的初期，卡特爾已不是少年時代而是成年時代了。凡原料產業鑛山產業冶金產業，都漸次趨向卡特爾化，走到獨佔的階段。」

這些龐大的組織，若指摘其弊病的所在，如利慾過強，獨佔太凶，以及操縱市場，把持經濟，莫不是其中最顯著的事實。但它既是近代社會中最重要組織，當然也有它的優點：第一、它資本雄厚，能夠使用最新的機器，促進工業的發展。第二、它以最新的技術從事大量生產，所製造的物品，當然價廉物美。第三、因為它組織龐大而體系嚴密，政府統制起來，較為容易。例如統制幾個大汽船公司或托拉斯，總比統制許多木船方便多了。我國在抗戰時期，管制物價所以困難重重，從組織方面說，因為農業社會的經濟單位過於分散，新式工商業的結合缺乏體系，自難收指臂之效。

德國在工業革命史上，可以說是較為落後的國家，但是它的工業所以能進展迅速，後來居上，它一經發動工業革命，便注意大規模的組織，未嘗不是一個重要原因。略舉數點於後，以見一斑：

一、德國卡特爾初期的組織

組織名稱	成立時間
鐵軌卡特爾	一八六四年
製鹽卡特爾	一八六九年
煤鑛卡特爾	一八七六年
車輛卡特爾	一八七七年
枕木卡特爾	一八七七年

備

考

由一八六四到一八七七年是德國工業革命的初期。

自一八七九年以後，德國的卡特爾更爲發達，其約數如後：

卡特爾約數 時 間 備 考

九十。 一八八五年

二百一十 一八九〇年

二百六十 一八九六年

三百 一九〇二年

屬於工業者二百二十、屬於商業者八十

三百八十五

以煤礦業組織最發達

德國由於煤鐵業組織的發達，機械工業也促進起來了。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是其機械工業最發達的時期，及至一九一〇年（距它的工業革命初期不過五六十年），它的機械公司的數量和資本，已有如下的程度：

機械部門 公司數目

股份資本

一般機械製造公司 四八五

八三四·二七百萬馬克

造船公司和船塢公司 二四

六九·八四

光學機械精密機械公司

三六·〇五

樂器製造公司

六五·九五

英國在工業上原是較爲穩健的國家，及第一次大戰爆發，因受戰火的緊迫，亦不得不致力於企業集中(Lancashire Consolidation)把託拉斯卡特爾的組織更加擴大起來了。到了戰後，爲着挽救經濟上的衰落，仍然致力於這個方向，如蘭開夏紡織業組合(Lancashire Cotton Corporation) 威格煤業組合(Wagen Coal Corporation) 蘭克夏鋼鐵業組合(Lancashire Steel Corporation)都是資本雄厚的龐大結合。

美國得天獨厚，環境順適，在工業組織上尤易於向龐大的方面發展。這個趨向，約分爲兩大階段，即十九世紀

為生產規模的擴大時期，廿世紀為企業管理的集中時期。

這種集中的大組織，如羅克佛拉(Rockefeller)的美孚煤油託拉斯，摩爾根(Morgan)的鋼鐵託拉斯，福特(Ford)的汽車康采倫，都是國際上最有聲勢的。

中國現在還趨趨於家庭式的舊工業組織與小規模的新企業組織之間，連西洋十八九世紀的局面還相差甚遠，無怪乎我們的國家，一方面戰時管理頗不容易，他方面平時生產不夠需用。茲專就工廠方面說，不惟數量少，而且規模小。看一看卅一年資源委員會的調查便可知其梗概：

組織類別	家數	百分比
一、合夥	九九四	四〇·八二
二、獨資	五六一	二〇·三四
三、公司	六八二	二八·〇一
四、公營及其他	一九八	八·一三
合計	二、四三五	一〇〇·〇〇

公司組織為現代工業中最能向大的方面發展的，而其比例只佔百分之二八，尚不及總數三分之一。至於合夥與獨資的工廠，論其組織，多半是舊式的。論其資金，也很難大有發展的，而其比例，竟佔百分之六一·六一，幾佔總數三分之二。

公司組織為什麼易於向大的方面發展，成為現代工業較新的結合？

第一、它是一個法人，有其獨立的穩久的性格。

第二、它能把許多零碎的資本，籌集一起，發生大的效用。

第三、它只負有限的責任，不因公司倒閉，而影響各股東股本以外的資產。

第四、它有股東會，董事會，監察會，與近代民主政治的作風有點相似。

至於合夥與獨資的組織，却缺少了公司的優點，似乎仍然帶着家庭工業時代的氣息；不惟硬性太重，而且範圍狹小，很難適應這個大工業時代的需要。近代西洋工業所以能迅速的發達，由合夥獨資進展為公司組織，確有很大的幫助。國人在農業社會過慣了家族生活，其經濟的關係，往往只限於家族與鄰里鄉黨，對於這種以廣大經濟關係為紐帶的公司組織，當然不很信任，漠然視之。中國公司之不易成立，這種心理上的因素，不無相當影響。

就令勉強成立，因為在農業社會浸沈很久的人，缺乏了組織觀念，有鬧意氣的，有不聞不問的，也很難順利進行，維持長久的時間。中國許多工業組織，其來也難，其去也速；從心理上講，這是農業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封建意識在那裏作祟。以後工業發達起來，這些意識，將要逐漸消除的。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以為「大規模的工業組織，一旦發達起來，恐推演所及，違反了節制資本的原意。」我以為全國的金融與交通，既均在中央權力之內，凡有獨佔性的工業，既定為國營的範圍，那末，無論那一個大規模的民營工業，即不必顧慮其雄據一方，形成「經濟上的藩鎮」。這種「藩鎮」只有在私人資本壓倒國家資本的歐美，容或易於成長，而在三民主義的中國，實難有其存在的餘地。

況且節制資本的手段，有初期中期後期的輕重緩急之別，何必在幼稚的初期，就給以嚴厲的限制，使工業連帶的不能發展呢。工業發展到了中期，似乎有了相當規模，國家為着財政的或國防的理由，當然要用累進方法徵收它的臨時資本稅，遺產稅，過分利得稅；並且制定災害賠償法，勞工保險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工福利金籌撥法；直接的為勞工謀利益，間接的減少工業家利用資本與組織的威風。及工業到了最發達的時期，大的企業具有壟斷的事實，侵及大眾的福利，再拿出強制手段，收歸國有，以實現民享的目的，亦未為晚。英國的工黨領袖說過：「工

廠兼併成爲龐大的組織，實在並無妨礙，因爲大的組織，到了相當時期，容易收爲國有。」再依據國父在實業計劃中的見解，尤足以證明大規模的工業組織，是經濟進化的結果，最後可用國有的方法調治其本身的弊害。他說：「大公司能節省浪費，能產出廉價物品，非私人所能及。不論何時何地，當有大公司成立，即將其他小製造業掃除淨盡，而以廉價物品供給社會，此固爲社會之便利。但所不幸者，大公司多屬私有，其目的在多獲利益，待至一切小製造業皆爲其壓倒之後，因爲競爭，而將各物之價值增高，社會上實受無形之壓迫也。大公司之出現，係經濟進化之結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諸通國人民國有之一方。」

所謂「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大公司僅是其中之一)既爲經濟進化的結果，而其弊害又可以主義或計劃經濟的力量調整醫治，我們這個工業幼稚的國家，何必因噎廢食，過存畏懼的心理呢。

我們不很贊成資本主義制度，乃是顧慮它壟斷的弊害，並非連它的「大規模組織」一筆抹殺。所謂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將大規模的組織，發揚光大，以適應「社會化」的需要，也並非取消它，分散它，回復到狹小的經濟體制。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規模組織，實在是建立民生主義的根基，若沒有這個根基，只想在小農或手工業的廢基之上實現民生主義，不過是黃金色的幻夢而已。

再由我國公營企業增加的情況看起來，私人的工業組織，雖讓它向大的方面發展，也不至於尾大不掉，造成「經濟上的藩鎮」。根據三十一年度經濟部所統計的後方工業概況，可見國家資本在重工業方面的比重很高，而私人資本僅在輕工業方面略佔優勢：

企業類別	公營企業百分比	民營企業百分比
水電工業	八九	一一
冶煉工業	九〇	一〇
企業類別	公營企業百分比	民營企業百分比
金屬品工業	三	九七
機器製造工業	七三	二七

電器製造工業	八九	一一	土石品工業	四九	五一
木材建築工業	四	九六	服飾品工業	八	九二
化學工業	七五	二五	文化工業	一六	八四
飲食品工業	二三	七七	雜項工業	六	九四
紡織工業	四九	五一			

根據這個趨勢發展起來，則公營工業的範圍，更要增加，國家資本的比重更要增高，也可以說明中國民營企業不至於走到獨佔這個地步。

總之，今後中國工業上的經營，既然以計劃經濟為重心，握着了中心關鍵，那末對於民營工業儘可讓它發展，使公私兩方共同致力於工業的建設。

所以國營工業固然要向大規模的方面，積極進行，而民營工業，也應獎勵它們同樣向大的方面努力邁進。否則，畏首畏尾，進退兩難，恐永遠停滯在半途之中而無迅速成功的希望了。

第十六節 中國工業建設的分區問題

- 一、戰後工業建設採取「分區集中制」的四大理由
- 二、「分區集中制」的目標在使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
- 三、戰後中國究應分為幾大工業區——三區的、七區的、九區的、十一區的、十二區的
- 四、「分區集中制」並非各區自給自足，而是造成有機的統一體

中國在抗戰以前，工業建設的地點，完全基於自由的，自利的立場，集中於沿海一帶。這種情形，從戰前實業部登記的工廠分佈區域（如下表），就可知其大概：

分佈地區 工廠數目

資本數目

備註

上海	一、二三五	一四八、四六四、四六三	僅這一個地方，工廠數目就佔總數三分之一
浙江	七八三	二六、一八三、九七六	這個沿海區域的工廠佔總數五分之一
江蘇	三一八	三九、五六二、七一八	這個沿海區域的工廠佔總數十二分之一
福建	一七〇	三、八四三、三七〇	
廣東	一〇一	一、四二七、七五八	
天津	四四	一一、七五五、〇〇〇	
威海衛	四三	二一五、六四五	
河北	一九	二二、〇四九、七〇〇	
青島	一四八	六、〇五一、〇九〇	
山東	一三七	二三、三〇八、一四九	
其他	九三七	一二二、三一六、五四三	包括南京市一〇二家，北平市一〇一家，湖北省二〇六家，河南省九一家，山西省九一家，安徽省二家，其餘在較遠內地區域在西北西南的工廠只有三百多家。

總計 三、九三五

三七七、八五七、七四二

域在西北西南的工廠只有三百多家。

這些工廠，因為大部分設在沿海區域，而中國又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備，保護沿海的國防，所以七七大戰一經發左，不被毀於戰火者，便淪入於敵手。若不是當時以最大的努力將一部分工廠的機械遷到後方，恐軍民更感受物資缺乏的壓迫，以至於影響士氣。

我們受了這次的嚴厲教訓以後，戰後的工業建設，自當採取分區集中的辦法，以應國防民生之需要。

所謂國防民生的需要，可以從國土的廣大，資源的分散，戰時工廠的分佈以及國防的條件分別說明的。

中國的面積約為四百三十餘萬平方哩，占亞洲總面積四分之一，占全世界陸地面積十五分之一，極東至東經一三五度零二分半之黑龍江烏蘇里江合流處的耶字界牌；極西至東經七〇度零二分半之帕米爾的巴達克山，極南至北緯一五度四六分之西沙羣島南端的特里屯島；極北至北緯五三度五二分半的薩彥山脊。像這一個面積寬廣的國家，如不在工業上採取分區建設的辦法，則全國的物質文化與民族意識，就不易融通一致，蔚為泱泱大國。

中國兼有寒溫熱三帶之長，物產與資源分佈是很廣泛的。如淮河以北的麥，淮河以南的米，東北的大豆森林，豫陝冀的棉花，外蒙及甘青新的羊毛，晉陝川湘的煤礦，甘肅新疆西康的石油，遼察鄂皖的鐵礦，湘粵桂贛的錳，贛湘粵的鎳，滇川鄂黔的銅，湘省的鋅鎳，以及各地其他的特產。若分區開發，就地經營，不但省去了許多浪費，而且可以發揮各地的特長。

再按抗戰期間工廠分佈情形（如下表），也可以證明戰後的分區辦法是必要的。

位次	地域	工廠數	備註
一	重慶	七八一	西南
二	四川	五六〇	西南
三	湖南	五〇八	西南
四	廣西	二六四	西南
五	陝西	二三三	西北
六	甘肅	一〇八	西北
七	江西	七三	

位次	地域	工廠數	備註
八	雲南	七一	西南
九	貴州	七〇	西南
十	浙江	四一	
十一	福建	三一	
十二	河南	二九	
十三	廣東	二四	
十四	湖北	一六	

十五	山西	一五	十八	綏遠	七	西北
十六	江蘇	一一	十九	安徽	五	
十七	西康	七	總計	十九省區	二、八〇七	

由上表看來，現在工業建設的地點在西南一帶者約占三分之二強，在西北一帶者約占八分之一強，合在一起，則西南西北的工廠，當占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這些工業，固然因為戰爭關係，被迫退到後方；但是於戰事結束之後，若再紛紛遷回，集中沿海一帶，必重蹈以前的覆轍。

最後按國防的觀點來說明。農業偏於「分散的」，工業偏於「集中的」。分散的經濟體制只適應消極的國防，集中的經濟體制，只適應積極的國防，所以在戰術上過去農業人民的防守性強，現代工業人民的攻擊性強，一個利於長期戰鬥，一個長於速戰速決，各有各的利弊。

時代進到現在，國防的目標，要能攻能守。以現在技術的突進，炮火的猛烈，非有攻擊的力量，焉有防守的精神。工業上採取「分區集中制」，便是要發揮「攻守兼備」的作用；把消極的國防，與積極的國防，融合一起。

總之，「分區集中制」的結果，在平時，使各地的工業都有發展的機會，以應民生之需要；一到戰時，又可以步步為營，顯出來軍事上儲備的力量，以達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

蔣百里先生有云：「合與分有聯帶的條件，這不僅是戰爭的真理，也就是人生生活的原則。如果種田的人反對織布的人，那麼他有飯喫，他可沒衣穿；推之百工之事，都是一樣。所以要「合」，才能「分」，同時又可以說要「分」才能「合」。所謂工業上的「分區集中制」，也就是「分」「合」相引相成的辦法。孔子云：「吾道以一貫之。」這個分合相通的意義也有它的一貫的道理。」

「分區集中制」的理由說明以後，進而討論分區集中制的辦法。翁詠寬先生主張分為三大區域：「一為中國本

部是為中心區域，包括華北、華中、及華南，其地北有豐富之煤田，中有便利之鐵礦，南有錫、鉛、鋁等有用礦產，西北有羊毛駝絨，西南有桐油豬鬃，東起海濱，西抵康青，人口既多，農業亦盛，交通既便，發展較易，以此作為中心，發榮滋長，首賴於是，亦即為中華立國之根本區域。二為東三省，有天賦最豐之林礦，又有人力已盛之工程，有陸海並用之交通，又為國際交通之關鍵。三為新疆，除塔里木盆地沙漠不易開發外，天山南北以及崑崙北麓，土多沃壤，礦產復豐，且地貫歐亞交通，實為西陲要域，自宜締造經營，認真啓發，以造成西北屏障。』此外，有主張設立七大區域的，有主張設立十二個區域的，有主張設立十一個區域的，見解很不一致。我根據各方面的條件，擬分為九大區域：

第一區——包括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假定戰後首都仍在南京，故以南京周圍四省為第一區。）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輕工業為主，重工業為輔。

2. 人 口 一萬萬零三百九十五萬多人

3. 面 積 五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多平方公里

第二區——包括湖北湖南二省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為輔。

2. 人 口 六千三百多萬人

3. 面 積 三十九萬七千五百多平方公里

第三區——包括四川西康兩省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軍需重工業為主，其他重工業為輔。

2. 人 口 五千九百三十五萬二千八百多人

3. 面 積 八十七萬三千多平方公里

第四區——包括貴州雲南二省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軍需重工業為主，其他重工業為輔。

2. 人 口 兩千一百五十六萬多人

3. 面 積 五十六萬六千四百多平方公里

第五區——包括廣西廣東福建三省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輕工業為主，重工業為輔。

2. 人 口 六千二百七十六萬多人

3. 面 積 五十六萬三千九百多平方公里

第六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如糧食工業）為輔。

2. 人 口 二千五百六十九萬多人

3. 面 積 一百一十一萬〇〇十三多平方公里

第七區——包括綏遠熱河察哈爾三省及蒙古地方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輕工業如毛織品動物食品為主，軍需重工業為輔。

2. 人 口 一千四百九十二萬四千八百多人

3. 面 積 二百三十四萬二千多平方公里

第八區——包括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四省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如糧食工業）為輔。

2. 人 口 一萬萬一千三百五十一萬多人

3. 面積 六十二萬八千一百多平方里

第九區——包括陝西甘肅寧夏新疆青海五省

1. 應特別發展之工業 以重工業軍需品及輕工業毛織品爲主以輕工業動物食品爲輔。

2. 人口 二千三百〇三萬七千多人

3. 面積 三百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多平方里

這九個區域分佈的要義，就大體上說想以輕工業置於沿海一帶，重工業置於中間一帶，軍需工業置於後方邊遠地區。這分法不是沒有彈性的，並且將來鐵道公路發達起來可使這九個區域互相聯貫溝通起來，成爲有機的關係。

這種分區集中的辦法，因爲各省的邊界，犬牙交錯，人口面積的比例，懸殊甚大，工業發展的條件至不齊一，所以很難定出一個完備的標準。我以爲在戰後應由經濟與軍事最高機關召集經濟學地理學軍事學專家，根據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以及將來戰爭的性能，作縝密的籌劃，方合乎客觀的需要。並且根據經濟與技術之力量，先就最重而最易於發展的區域，努力建設，然後再逐漸推廣，以符合重點主義的目標。

分區集中的區域確定以後，可效一九一四年的法國辦法，每一個經濟區域，設立一個總機構，以負督促指導之責。不過各區域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封建的」或「割據的」，而是隸屬於神經中樞，構成一個體系的。

近來各省引爲最得意的「自給自足」，在戰後是要消除的，使中國整個的經濟體系，不因爲分區而割裂破碎。換言之，所謂「自足自給」在現在交通發達，生活水準很高的時代，各國尚不易實現，而在一個國家之內的一省或數省區域，尤難辦到。國民經濟要成爲整體的、「統一的」，是我們分區集中的前提。也是我們分區集中的後果。許德珩先生在論「中國工業化及其前途」一文中，竟主張「各區域的經濟發展，當求其能自給自足，」我以爲這與「分區集中制」的原意，太不符合。他說：「工業化了的區域之能自給自足，是緊要的、是好的，並不怕他割據；

因為割據這件事，只是在封建經濟之下，在原始的幼稚的生產工具與交通工具之下，或是在帝國主義劫持之下，才有可能。』工業分區建設的目的，從民生方面說，是將各地的資源通通的開發起來，使全國人民共同的享受現代化的生活。以現代化的生活標準之高，非各地有無相通，如何能達到豐足的希望呢？所以自給自足的結果，無異乎降低人民的生活標準，使其重返封建的圈套中。生活的封建性，往往影響國家的統一，這是不可不顧慮的。

第十七節 中國工業建設中的土地問題

- 一、工業建設既須生產的社會，亦須消費的社會
- 二、土地問題之解決對於工業生產與消費，兩有裨益
- 三、平均地權應在節制資本之先
- 四、現在中國的地主對於農業的態度是最落伍的，尚不及十八九世紀的歐洲
- 五、土地的所有權經過了調整，許多農民才可採用大農制及新式農具
- 六、許多農民經過土地所有權的調整及新式技術的採用以後，收穫必比以前豐富。這不但工業的生產與消費隨之提高，即政府的收入亦將為之增加。

✓ 無論按工業的生產或交易來說，都需要對當前的土地問題，予以必要的、迅速的調整解決。土地問題予以調整解決以後，則土地的生產力以及一般人民的購買力都可以大大的增加，使工業上的原料與資金，有洪流似的來源，工業上的製成品，有熱鬧的市場與出路。否則，像現在土地的所有關係及生產能力，即令工業建設成功，試問工業的製成品向那裏找出路？向外國找出路嗎？人家是工業的先進國物美而價廉，我們絕無競爭的資格。向國內找出路麼？大多數的農民連簡單的生活尚難維持，那還有剩餘的資力購買工業品呢？所以工業建設的方針不但要從生產方面下手，還要從「消費方面」注意。國父說：『由漢冶萍這個公司來考究，實業的中心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漢冶萍雖然有大資本，但是生產的鋼鐵，在中國沒有消費的社會，所以不能發展，

謔是不能賺錢。因為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現在中國和外國比較起來，可以說是沒有現代消費的社會。有些人過的原始生活，有些人雖係小康，也不過是在節約之下維持現狀罷了。至於少數的大地主，因受封建社會的因襲關係，有錢亦不會用，用，亦不合現代消費的意義。這個消費的社會，怎樣才可造成，以適應生產的社會之需要呢？最切要的方法，便是從土地問題下手，使許多人民隨着農業的改良而增加購買能力，提高其生活程度。但是中國現在土地生產情況，可以說是最落伍的，不惟比不上歐洲有些國家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農業，即連他們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情況也還有些不如。茲以英德為例，敘述他們優越的地方以證明我們落伍的情形。

英國的農村到了十八世紀中葉，還停滯在莊園階段。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突然湧起了大規模的「後期圈地運動」。這個運動固然是大魚吃小魚似的土地兼併，噴出來腥血似的濺流，可是就生產方面說，農業却得到了大農經營與新式技術的運用機會。日本掘經武有這樣的一段話，可資參證：「依着辛克拉爾（John Smeaton）及楊格（Arthur Young）這班擁護圈地運動的人所持的意見，證明農業的營利觀念實在可以因圈地運動而脹大起來，使農業的生產力，特別增加。經營農業的人們，因有地租與利潤的慾望，當然需要科學方法的輪耕（The Scientific Rotation of Crops）深耕，以及農業機械等。但這種種設備，都是需要很多資本的，決不是小農的力量所能辦得到的。」因為英國的大農制度由此興起遂于一七九三年創立了一個農業調查會，推廣新的技術並有好些農業學者潛事研究發明，如布拉德萊（Richard Bradley）的四年輪耕法，塔爾（Jethro Tull）的農場實驗，培克維爾（Robert Bakewell）畜牧法，都是比較有名的。大地主們既有阡陌相連的土地，再加以企業觀念的吸引，對於這些新式技術，是歡迎採用的。如大地主科克（Thomas William Coke）這個人便是用這樣作法而得到巨大的利潤的。

德國在他的工業革命的前夜，農業經營因受英國的影響，科學家的提倡，技術方面也有了相當的進步。所以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農業上的收穫比過去增加甚多。從中葉起，德國踏上了工業革命的大路，農業因受工業技術的幫

助，進步更大。由下表所列德國農業技術的發展，便可窺見一斑：

農業機械	一八一八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打穀機	二六八、三六七架	五九六、八六九架	九四七、〇〇三架
蒸汽打穀機	七五、六九〇	二五九、三六四	四八八、八六七
播種掘地機	—	一四〇、七九二	八三、一二五
刈割機	一九、六三四	三五、〇八四	三〇一、三二五
播種機	(六三、八四二)	二八、六七三	二〇六、九一四
肥料撒佈機	—	一八、六四九	?
蒸汽機	八三六	一、六九六	二、九九四

此表所列新式農業機械的採用，是包括了小農與大農，不過大農方面採用的範圍較為廣大些。新式機械採用的效果，不用說是荒地逐漸減少，收穫大量增加，以與工業的進展相配合。

我們從英德兩國在工業革命前後的農業狀況看起來，就可知中國地主如何的守舊以及因地主過于守舊，農業如何的落後。略述這種守舊落後情形，以指明土地問題的癥結：

中國地主們對於土地兼併的熱望，並不下於十八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可是人家圈地的結果，是以「企業家的精神」採用新式技術，開墾利用，以增加農業上的收穫。換言之，這些地主的頭腦似乎比封建時代的地主進步些，開明些，會在經濟上迎接新的機運；至於中國的地主們，絕不講究這些生產的技術，只會在家裏等着收租，享受清福。至於佃農生活的改善以及協助佃農謀技術上的改良，他們向來就沒有打算過，而且根本沒有這種心思。中國農業一直在這種所有關係與經營方式之下，過了數千年之久而無什麼變動。現在雖是廿世紀，而這般地主們仍然是如此的頑固、守舊，和古代的情形並無二致。你看現在的土地富翁，誰有英國科克地主式的雄心，想以科學方法實驗

農業上新技術呢？走遍全國，恐怕找不到幾個吧。按嚴格的社會科學立場說，這種科克式的企業精神支配下的農業經營，是大有批評營議的地方，可是他吸收新式技術以求經濟事業進步的精神，卻不可一筆抹殺。可憐中國的地主連這點精神都沒有，那還有甚麼可取之處呢。所以在中國地主與佃農的經濟關係之中，極難有什麼生產改進計劃或機器技術的活潑刺激。這就是中國社會停滯的原因及經濟桎梏的所在。

因為有了這種桎梏，我們農業上的生產，是很可憐的。如稻米的產量，日本每英畝可達二、三五〇磅，中國只能達一、七五〇磅；小麥呢，只及丹麥四分之一；棉花呢，只及埃及五分之一。中國向來自豪以農立國，而農業品竟不及這些貧瘠或狹小的國家，還要每年仰仗國外大量輸入食糧、布匹，這真是我們經濟上的恥辱。

✓ 要想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應先改變土地的所有關係，使一般農民，第一有耕種的土地，第二有耕種的興趣，第三有改良耕種技術的方法。關於此點 國父曾有沈痛的指示。他說：『中國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他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的不過十分之四……農民在一年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之外，還有七個增加生產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國父這一段話，指示出來農民解放以後，才有採用新式技術的可能，殊堪為工業建設中土地問題解決的方針。前面說過中國地主的頑固守舊，已根深蒂固，對於新的技術，實在沒有採用的興趣，而佃農又因為隸屬關係以及因為生活貧困而無受教育的機會，也難有採用新技術的能力。所以在西洋的土地集中之下，農業技術尚有大的進步，而在中國，則不可作如此的希望。

佃農既因經濟的教育的限制，無法使用新的技術，而其數量又有下表所列的衆多，所以無論就「質」與「量」來說，都含有嚴重的意義：

中國農戶百分比表

省份	佃農	半自耕農	自耕農	省份	佃農	半自耕農	自耕農	省份	佃農	半自耕農	自耕農
江蘇	三四	二七	三九	山東	一〇	一五	七五	廣西	三四	二五	四一
浙江	四五	三〇	二五	山西	一五	二〇	六五	雲南	四二	二六	三二
安徽	三七	二三	四〇	河南	二〇	二二	五八	貴州	四四	二四	三二
江西	三八	三五	二七	陝西	一八	二一	六一	察哈爾	三一	二六	四三
湖北	三六	二八	三九	甘肅	一九	二〇	六七	綏遠	三二	一一	五七
湖南	四四	二九	二七	青海	一九	三〇	五一	甯夏	一八	一四	六八
四川	五二	二四	二四	福建	四二	三二	二五	平均	三〇	二四	四六
河北	一一	一九	七〇	廣東	四七	三二	二一				

半自耕農的情況和佃農相差無幾，二者合在一起，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四，已經有一半之多。再按中央農業實驗所廿二年報告，近來佃農更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則其嚴重的性質，恐將有增無已。這麼多的貧窮農民，因為日漸困苦，而無力改良農業，則其對於工業上的影響一定是無建設的本錢，二無消費的資格。所以土地問題如不解決，不僅只桎梏了農業的發育，並且妨礙了工業的建設。所以站在工業建設的立場，也要希望土地問題先有了解決辦法。國父在民生主義講演中有云：『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雜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國父把解決土地問題定為頭一個辦法，並列在節制資本之先，這是很有根據很有深意的。

所謂平均地權包含兩大意義，一是所有權的限制與轉移，二是生產力的改良與增加。所有權的限制及轉移，即規定「坐食地主」的土地分給有自行耕種能力的農民，或變作國營農場。並限制一般農戶的土地所有額，至多不得超過若干畝以上。這些所有權轉移的土地，應儘先以集體方式，鼓勵大家合作經營，以發揮大農制的精神。而且也只有實行這種方式與體制，才能利用新式技術。因為這個原故，凡工業國家，莫不向大農方面發展。

看重要國家的農場面積與中國的農場面積之比較，足以證明中國農場亟有擴大之必要。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場平均面積和歐美的比率是：澳洲大一百七十九倍，加拿大大六十三倍，美國大四十二倍，英國大二十二倍，法國大七倍，就連那幅圓很小的比利時，希臘也比我們大三四倍之多。蘇聯的集體農場，規模更大，平均每場有四百八十四公頃以上的耕地，並有兩千萬戶的農家，參加這種經營。

農場的規模擴大以後，那些火犁，複合機，播種機，曳引機，動力水車……形形色色的農業機械，才有應用的可能。有了這些機械，然後才可以約聘農業專家，協助指導，以求生產上的進步。

許多農民由土地所有權的調整，經過集體合作的鼓勵，最後達到農業機械的採用，其耕種的興趣必隨之濃厚，其生產的能力必隨之增加。如此收穫的成果，除向政府繳納，並付必要的開支以外，所剩餘的部分，一定比現在個農的所得，多出數倍。這些多出的部分，便可以作為提高購買力及生活水準的餘資了。

「這樣作法，不但農民的購買力及生活水準得以提高，即國家的收入亦可以藉此充裕。因為就現在土地的所有，關係許多農民的收穫，有一半以上是繳給地主的；若用上述的辦法，這一半便應該繳給國家了。國家得到這一半的收入，則工業建設的資金以及農業機械的費用，便有了源源的供給。

至於食糧問題及工業原料問題，當然也可以隨之解決，不患沒有豐富的來源。

總而言之，土地問題用這些原則解決下去，凡關於工業生產的資金，原料，工業消費的購買力，都連帶的有了來源與出路。中國既以工業建設為戰後的總目標，就應有解決土地問題的決心，使雙方發生配合適應的關係。

第五章 工業建設與計劃社會

第十八節 社會計劃

一、社會計劃與計劃社會之區別

二、由原始游牧農業時代所見的社會計劃之潛能

亞理士多德 (Aristotle) 所謂潛能 (Potentiality) 與現實 (Actuality) 是有差異的，即潛能為內在性能，而現實則為運用內在的性能使其發揚光大，以達到進步的最高的境遇。二者雖有生理發育上的連續，但並非同一的實體。茲試以此種理則的觀點，研究人類社會的計劃性及其可能的發展。

人類社會自原始時代至現在，約經過五十萬年的時間。在這五十萬年漫長時間之內，改變了許多社會的類型，如由血緣社會中的氏族 (Clan)，宗族 (Tribe)，部族 (Phratry) 部落 (Tribe) 而進到地緣社會的封建關係；再由封建關係育成了以血緣契機的資本制度。社會類型不論如何變化更替，總是由「微溫的」社會計劃，趨向高熱的「計劃社會」，由「部分的」社會計劃，趨向總體的「計劃社會」。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所謂世界大同的社會，易辭言之，不過是高熱的，總體的計劃社會而已。

「社會計劃」是指有意識的，局部的社會活動而言；「計劃社會」是指全體人類「社會有理想的有機性的活動而言。無論原始社會，宗法社會，佛特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有社會計劃的事實，但是計劃社會」，非在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指導之下，不易促其實現。

人類社會的原始羣 (Original Horde) 不論其為單系的 (unilateral)，或雙系的 (bilateral)，都有男女分工及年

齡分工的組織，以維持共同生活的體系，由男女分工演進為固定的婚姻制度；由年齡分工演進為長幼世代的禮俗。這種以「血緣」與「技術」為中心的社會組織，便是最原始的社會計劃。

因為原始人類的技術能力是極端的簡單貧弱，而天然的武器如手、足、齒牙，又不如猛禽野獸，所以人類是自然的奴隸，對於森羅萬象的宇宙變化，必表示驚奇恐懼的心理，形成了萬物有靈說 (animism) 馬拿說 (Manatism) 及祖先崇拜說。這些自然哲學的端緒，便是原始人類的社會計劃之根據。

由這個心理上的發展，樹立了圖騰制度 (Totem) 作為敬天、治人、抗敵禦侮一個有力的工具。甄克斯 (Totens) 云：「蠻夷之所以自別也，不以族性，不以國族，亦不以部落，而以圖騰。圖騰之稱，不始於澳洲，而始於北美之紅種。顧他洲蠻制，乃與不謀而合，此其所以足異也。……聚數十數百之衆謂之為圖騰，建蟲魚鳥獸百物之形，揭槩之徽幟。凡同圖騰，法不得為牝牡之合，皆從母以奠厥居，以莫知誰父故也，澳洲蠻俗圖騰，有祭師長老，所生者，聽祭師為分屬，以定圖騰焉」。由此看來，圖騰制，實係原始人類根據他們的自然主義或超自然主義所作的實施計劃，以維護社會的存在。

原始時代進步到游牧時代，所謂社會計劃的潛能更為之發育了。奧彭海姆 (Oppenheimer) 在他的國家論 (The State) 中說道：「狩獵民最好人自為戰，或以小集團而動作。反之，游牧民最善以大隊而行動。在大隊中，個人的保護最周。大隊在行動上是武裝的行軍，而棲息的地方，便成為武裝的營幕。於是戰術演習的科學，嚴厲的服從，及堅強的紀律，隨之發生了。如羅齊爾 (Rocher) 所說，「如果把太古以來已存在的天幕排列的秩序，算是游牧生活中紀律的力量，那是不錯的。每一個人，每一個物，在天幕中都有確定的傳統的地位。因此，出發和止宿，建設和再建，才能夠迅速而有秩序。從沒有聽見說，有一個人，沒有命令或迫切的理由而變換他的地位的」。因為有這樣嚴厲的紀律，天幕竟可以在一小時的時間內，包裝起來。攜帶前進」這種社會生活的方式，固然有點機械，但是就戰鬥性的計劃方面來說，確是比農業民族更進一籌。中國自黃帝與蚩尤作戰以後，什麼匈奴，突厥，或在邊疆作

戰，或侵入中國稱王稱霸，都可用這個道理，作為解說的一個根據。

農業人民的戰鬥計劃雖不如游牧人民，但是對於土地經濟的計劃，確比他們進步。如中國的井田制度，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孟子滕文公上說：「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在此田制中，確如班固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井田制度破壞以後，而此種互助的韌性的精神，仍遺存於後代。以此種粘着於土地之上的互助精神與堅韌毅力，對付那些流動性的軍事性的游牧人民（如何奴突厥）所以才能屢敗屢戰，堅持到底。

以上所舉原始時代、游牧時代、農業時代的各類社會計劃，都不足以稱為「計劃社會」，因為第一，施行「總體計劃」的社會，必須是工業技術很高的社會；第二，因為計劃社會須有遠大的社會理想，以改善人民生活，確保社會生存，發達國民生計，光大羣衆生命為目的。而這兩大要點，在這些例證中，都找不出其踪跡，如何能夠算得上什麼計劃社會呢？

第十九節 計劃社會

一、柏拉圖謨爾傳星葉等所理想的計劃社會

二、祇有社會理想而無科學技術絕難建立計劃社會

古今來許多社會思想家在他們的腦海裏面，一定有桃花春夢似的社會理想。這種理想的圖案，對於社會經濟的行程，如何規劃；對於人民生活的內容，如何改進，自然有繪影繪聲的描寫。

例如老子的理想社會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自足自給的鎖國主義的小農社會之理想，以哲學家的筆調描繪起來，頗有動人之處，可惜按社會進

德的原則及技術主義的立場，却是開倒車的办法，永與人羣社會格格不入。

次如柏拉圖的共和國 (The Republic) 是希臘社會思想光明的活泉。他在這部傑作裏面，指示出來窮人易於違法，而富人則流於淫侈，要想防止這種社會的禍源，應該規定每人有至少限度的財產，至多不能超過這個限度的四倍。如若超過了這個限度，便須徵收值百抽百的稅率。他所理想的社會經濟的目的，不在乎企求物質生活的幸福，而在防止慾望的橫決。這個哲人的世界，這個恬靜的畫面，固然可以引起我們心嚮往之的心情，可是與社會進化的方向，未免背道而馳，我們又只得望望然而去之。

在近代以前，所有理想社會的著作中，除柏拉圖的「共和國」以外，沒有比得上謨爾 (Thomas More) 的烏託邦 (The Utopia) 了。從思想體系上看，謨爾的學說是繼承柏拉圖的，是發揚柏拉圖的，所以他兩個思想，有互相貫通，前後輝映的美點。在謨爾的烏託邦裏面，社會計劃如此的：「經濟基礎為農業。除農業以外，每人必須學習一種技巧的職業，以增進社會的生產力。這些工作的分配與管理，統由里長 (Syphogrants) 負責。在里長管理之下，無論何種人物——僧侶，紳士，婦女，都得參加勞動生活。一切勞動，一切職業，都要富有生產的意義。否則，凡徒然增殖社會上淫侈奢靡的風氣者，都在禁止之列。人人既都作有益社會的活動，自然無懶惰頹廢的分子，而每天的工作時間，只有六小時便夠用了。一旦失業問題發生的時候，那末，把大眾工作的時間由六小時減少為四小時，就可以使無業者有業了。若有業而怠工，或無業而犯罪，就不得不採取強迫工役手段，以資懲罰」。整個社會在這樣工作中作有規律的發展，這便是謨爾的計劃社會之理想。

再如十九世紀的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的理想社會，為「法朗棋」(Phalanx)。一個法朗棋是由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組織而成，以生產與消費的共產為目的。每個法朗棋的主要經濟為農業，由公共經營，次要的經濟，如手工業，則由自己經營。每個工作單位是由五人或七人組織之，按照勞力、資本、才能、分配其工作的成果，即勞力得十二分之五，資本得十二分之四，才能得十二分之三。一人至少有三十種工作的能力，一日之內，可以更換工

作七八次之多，以增加工作的興趣。

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也如老子的社會思想，一樣的實行不通。所以他於一八三二年在凡爾賽附近成立一個新村，試驗他的理想，終歸於完全失敗，至一八三七年滿懷遺志而長逝了。

此外，培根 (Francis Bacon) 在他的新西方樂土 (The New Atlantis) 大作中，計劃在一個島國上，如何過着美滿的幸福生活，康貝納爾 (Thommaso Campanella) 在他的太陽城 (City of Sun) 這部書裏，主張社會要按平衡的鐵則達到完美的發展；哈林頓 (James Harrington) 所著的一部羅漫斯名為奧斯那 (Ocean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of Politics) 主張選舉優秀知識分子，管理政治，作改善社會生活的夢想，以及莫理斯 (William Morris) 的「烏有鄉消息」(News From Nowhere)，柏朗梅 (Edward Bellamy) 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 和「平等」(Equality) 這兩部著作，——都各有各的一套理想社會之計劃，希望在現實的世界裏面，把它樹立起來，或者依據這些計劃，把這個現實世界改造過來。這些理想的計劃，高則高矣，美則美矣，只因為沒有現代高度的科學技術及豐富的物質基礎，所以永遠成爲烏託邦式的小說，或桃花式的春夢，絕難在現實的世界裏面，屹然的樹立起來。

從這些例證看起來，「計劃社會」不但要有高尚的社會思想貫注在裏面，而且要運用現代高度的科學技術與豐富的物質基礎。社會思想爲「計劃社會」的指針，「科學技術」爲「計劃社會」的工具——二者交相運用，那末，「計劃社會」才有本有源，有體有用的發揚光大起來。

在封建時代，因為沒有高度的科學技術與由科學技術所創造的豐富物質，無所謂「計劃社會」，就令有「計劃社會」的理想，也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在中國目前小生產制的基礎上，「空」喊社會主義是不行的，只有從科學技術與工業建設中加緊努力，社會主義才有它的前途。蘇聯在大革命以後，從經濟的痛苦中，體驗到沒有現代工業技術的深厚基礎，社會主義僅是空想的而不是科學的，因此，自一九二八年起，才下最大的決心，致力於工業建設。上述僅有社會理想而無科學技術與工業基礎，不足以創立「計劃社會」，下面再說明僅有科學技術與工業基礎

而無社會理想，也一樣的不能創立「計劃社會」。如資本主義社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這個基本的原因，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與計劃社會的精神，永遠不能並立，即資本主義在求個人的利益，計劃社會在求整個社會的共同福利。

資本主義的毛孔中血管裏，無不懷着強烈的營利精神。十八世紀以來，無論天之涯地之角，都有資本主義的鐵蹄，便是由於這個營利精神在前面吸引者鼓動着。這種精神純粹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當然缺乏高尚的社會理想。資本制度在這營利主義之下，作自由的經濟活動，全體社會自然呈現「無政府的」狀態，發生了各種各樣的病態。

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論其科學技術如何高明，工業程度如何進步，而由於它的先天弱點，與後天失調，絕難實施「計劃社會」的理想。

中國現在既未達成壯健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本身又有民生主義的社會理想，所以，我們想促成「計劃社會」的實現，首先須提倡科學技術，與工業建設，以增強物質力量的基礎，否則，所謂民生主義的計劃社會，恐怕只令人心理上的羨賞而已。

總之，「計劃社會」既不可專靠社會思想家的理想，亦不可專靠科學技術與工業建設的力量，而是二者的密切合作才有體有用完成起來。

第二十節 計劃社會的中心問題——計劃經濟

一、個人主義的興起及轉變

二、從自由經濟到管制經濟，從管制經濟到計劃經濟的理由

在波濤翻騰的近代歷史的洪流中，經濟方面有一個很顯著的趨向，即是：由自由經濟到管制經濟，由管制經濟到計劃經濟。

近代的初期，個人主義的思想，好像是暴風驟雨，震動全歐洲人的心理，霍布斯（Hobbes）用「人類最初是自我中心的，是自私自利的」這個觀念，說明他的社會理論。盧梭（Rousseau）的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上第一句話：「人是天性自由的，但現在却處處受束縛」，所以他的中心理論是「回到自然」（*Go Back to Nature*）。佛爾泰（Voltaire）更激烈了，他以尖刻的筆調，動人的學說，攻擊一切制度的罪惡。這幾個思想家都是對於社會的活動，作個人主義的解說。至於亞當斯密從經濟活動上提倡個人主義，影響近代社會的發展，更為深刻。他以為人人都有自愛心（*Self-love*），自利心（*Private Interests and Passions*），當然各自很會自然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環境。這樣改善下去，既可利己，又可利人，國家何必再多事干涉呢？他這樣的主張，使個人自由在經濟上得任意發展的機會，樹立了近代資本主義之理論的基礎。

這種以自私自利為出發點的自由經濟，推演出來最大的弊害，莫過於財產權的濫用。

十八世紀的人士，認為財產權利是有絕對性的，不受限制的人權。如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第十七條，「財產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拿破崙法典第五四四條規定，「於法律所未禁止之範圍內，得以最絕對的方式，使用財產及處分物件的權利」。以這種絕對性的，神聖的觀點，來處置自己的財產，按好處說，可以發展個性，自由競爭；按壞處說，可以濫用權利，妨礙社會。例如肥沃的土地，竟讓它荒蕪下去，堂皇的房屋，竟讓它空空如也，沒人居住，這都是有財產而不把財產的效用發揮出來的怪象。更甚的，現在還有損壞貨物，暴殄天物的。以前美國商人為要減少牛乳生產量，屠殺六十萬的母牛；因為豬價便宜，屠殺六百二十萬頭公豬，二萬頭母豬；因為大麥便宜，加拿大用來作燃料；因為咖啡便宜，巴西把二千七百萬袋咖啡投到海裏；其餘如阿拉斯加，西班牙，英國，法國的商人們，都把現成的魚放到海裏；錫蘭燒毀三萬噸茶葉；德國燒去四萬隻紡麻錠子；法國將許多桃杏投到垃圾堆裏去——都是濫用財產權所醞釀出來的病態與毒素。

因此豪維約（*Hauriour*）與狄驥（*Ducuit*）極力提倡財產權應以社會職務為基礎。狄氏說：「按照舊日的學說

，財產權應以個人的自由為淵源的，是以個人各有處分其工作所得的權利為根據的。這種學說，在從前幾個時代，雖曾享受很大的信用，然欲憑藉此說以作現代社會中的財產之根據，其力量實絕對的微弱。不動產，企業家資產以及遺產，只能於社會利益中求得一個說明；倘欲證明此種私產為合法的，必須證明此種私產，有益於社會而後可。

「由上所述，便發生重大的結論。即財產既純以社會利益為根據，自亦只應於其能給社會以利益的範圍以內而存在。所以立法者應根據社會的需要，而對私產予以種種限制。財產絕不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而為一種依照社會的需要，繼續變遷的權利。如果到了某一時期，私產的存在，不復與社會的需要相適應，立法與司法者自當出而干涉，由法律及執行法律的判例，按所有者所應履行的社會職務，為之決定。我們可以說財產權為固有權的觀念，在事實上，已經消滅，而為財產為社會職務的觀念所代替」。

財產權既不以個人自由為基礎，而以社會利益為根據，所以現代各國立法的條文及法院的判例，多採用此種思想。德國憲法一五三條云：「財產負有義務」，第一五五條云：「土地之種植與使用，應為所有人對於社會之義務。」德國民法典第二六六條云：「凡一種權利之行使，僅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者，為非法」。瑞士民法第三條云：「凡公然濫用其財產權者，不受法律保護」。這些條文，都很充分的表現現代財產觀念並不是有絕對性的，而是要受社會利益與公共幸福的限制的。

根據這種觀點，凡個人財產的使用不合乎公共幸福及戰時需要，政府採取干涉手段是合理的。如因國防關係，或民衆生活的改善問題，國家經過立法的程序依法徵用其土地，房屋，糧食，及物資，也是合理的。

各國為達成這種任務，所積極推行的土地徵用，集體農場，公益優先，通貨管理，出口定量，入口定量，強制儲蓄，以及戰時形形色色的定量分配制，日用品公賣制，都是屬於「管制經濟」這一個大的範疇。

管制經濟與統制的性質，並不完全一致。前者是順乎社會的發展而生長出來的，後者是為醫治一九二九年以來

的經濟恐慌而推敲出來的，所以管制經濟比統制經濟的歷史久遠些，範圍廣大些，意義深遠些，效果顯著些，只是現在各國在大戰方般的緊急關頭，一切經濟的活動，都在統制之列，這裏面既有管制經濟的性能，亦有統制經濟的力量，我們却難辨別這二者的截然區別。

總之，時代踏入了二十世紀，管制經濟得了成長的機運，所謂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隨時代的消磨，漸成爲歷史的陳跡。哈佛大學的有名教授勞特（Roscoe Pound）在社會利益論（A Theory of Social Interest）一書中曾以新的觀點，歸納近代的趨向云，「十九世紀中，一切的利益，都以個人的利益來解釋，都是推究到純粹個人的原則，而被認爲個人的權利。在二十世紀中，便不同了，小而如私人生活，大而如社會經濟文化的活動，無不運用法律的力，使適合公共安全的社會利益」。著名的社會學家白拉克麻（Frank Wilson Blackman）對於這個問題也作了警闕的評論，「唯一正當的個人主義是建立在爲人服務的基礎上的」。

爲甚麼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受了現代人士的批評與擯棄，爲甚麼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竟爲管制經濟所代替？這至少有下面幾個理由：

第一、從社會的本質觀察。貞克斯（Jenkins）說：「社會者，萃居之民，有所共守之約束，所同斬之境界。是故偶合之衆雖多，不爲社會，萍若而合，絮若而散，無公切之達意，無同求之幸福，經制不立，無典籍載記之流傳——若此者，既不足以言羣，更不足以云社會矣」。足見社會的本質，便是「有組織的」集體，否則，一盤散沙，或烏合之衆，何能算是一個社會呢？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發生經濟的恐慌，實由於它的生產、消費與分配，陷於無政府的狀態違反了社會的本質。有些人所羨慕的安那其主義（Anarchism），所以永遠成爲鏡花水月，亦緣於此種理想與社會的本質絕不適合。

根據這個觀點，原始社會並沒有所謂個人主義，而以集體爲公共生活的歸宿。波格達諾夫（Bogdanov）有云，「從經濟學的見地看，特別重要的是觀察原始思想的集團主義，各人的心理上沒有把自己放在所屬的集團之外，他們

不認自己為利益或努力的中心，不像近代人一樣以自己為我，却把自己當作全體的一部分融和於集體之中」。原始社會的本質既然有其集體組織與共同約束，那末由原始社會進化到現在當然需要更精密的集體組織共同規範了。

第二、從個人主義的弊害觀察。個人主義是以自我的幸福作出發點，以廣大的世界作為自由活動的範圍而在「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國家或民族，是絕不在他們眼下的。所以絕對的個人主義如在某一個國家猖狂起來，這個國家便有覆滅的危險。此次大戰，歐洲巨強所以於一個多月期間為德國閃擊敗北，其要緊的原因之一，恐係由於個人主義在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泛濫的作用。

純粹的個人主義不但侵蝕國家的生命，同樣還可以腐化個人的生活。因為個人的生活若漫無標準，久而久之，浪漫成性，精神便易於頹廢，缺乏了生命之力。

純粹的個人主義既妨礙了國家，妨礙了個人，那末以個人主義為依據的自由經濟，當然有淘汰其弊病的趨勢，而用管制經濟代替了。

第三、從現代國家的職權觀察。十八九世紀的人士認為國家的職權越簡單越好，簡單到成為「更夫式的」國家，只負維秩序之責，便合乎理想的標準了。現代因社會生活日趨繁複，國際鬥爭，日益激化，於是那「更夫式的」國家理論，却不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了。

國家的職權由「消極的」趨向「積極的」以後，國民經濟生活的管理，自然成為政府的任務。如德國一九一九年的憲法，被稱為「經濟憲法」對於人民的經濟活動，予以種種限制，都是受了這種「新的國家理論」的影響。

第四、從現代戰爭的性格觀察。現代社會經濟的飛躍發展，增強了經濟在戰爭中的作用，所謂純軍事性的戰爭，變成為歷史的陳跡，所謂經濟原素成為戰爭的決勝條件，從此創立。什麼叫做戰時經濟體制，或準戰時經濟體制，明白言之，不過是全國的經濟活動，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總目標之下，作統一的周密的調整與管理而已。由這四個理由看起來，可以證明由自由經濟趨向管制經濟是順乎社會的發展，適合環境的需要，於理於勢，均

不得不如此的。不過我們所稱許的管制經濟，是指「社會化的管制經濟」而言，它是以保障國家民族的生存，促進社會人羣的福利為目的的。假如違反這個目的，如極權國家或侵略陣線的各種經濟管制之企圖，那當然是大時代的逆流，遲早要受淘汰的。

中國正向社會化的管制經濟之途徑前進，且因建國的需要，更使管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相成相因，融為一體，以期實現民生主義的偉大理想。臨全大會宣言有云：「抗戰期間關於經濟之建設，政府必當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由國家籌集資本，從事興辦，務使之趨於生產的合理化，且必制節謹度，樹之楷模，其宜於私人企業者，由私人出資舉辦，於國家整個計劃之下受政府的指導及獎勵，以為有利的發展。私人企業既因國家銀行與重工業及交通網之發達，而遂其生長，則於節制資本之目的，既無違背，而私人企業心亦得所滿足，不惟直接關係國防的經濟事業，得以活潑進行，即關於社會普遍繁榮的經濟事業，亦因以發展。使最大多數人人民生活之水平益，得以增高變長」。

就形式上與內容上看，管制經濟與計劃經濟好像沒有什麼區別，其實是不同的。茲將其區別，略述於後：

計劃經濟是以整個的國家或社會為單位，比管制經濟的範圍更要廣大深入些。例如管制經濟往往只注意生產問題，而計劃經濟呢，不但要注意生產問題的合理解決，同時也企求分配問題的合理解決。

管制經濟是以管理統制的方法為首要，以促進社會福利為次要，計劃經濟是先根據社會的實際需要，創造理論的體系，再由這理論的體系，規劃實踐的方法。

管制經濟加上高尚的社會理想與現代的科學技術，便成為計劃經濟，所以計劃經濟比管制經濟進步些高明些。由自由經濟到管制經濟，由管制經濟到計劃經濟，將是社會進化的歸宿。

第二十一節 計劃經濟的類型

一、微溫的計劃經濟與波行的計劃經濟

二、景氣型的計劃經濟與國防型的計劃經濟

三、先進國的計劃經濟與落後國的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在社會行程中，現在還是一支正在進展的「伏流」。

因為這是一支「伏流」，世人對於它的真面目，還沒有認識清楚，往往從許多角度方面，觀察它的形體，億想的風度。下面略舉幾種重要的觀點，以見其意態的混淆。

在庸俗的社會學者的心目中，是沒有整體的理論的，它們只會憑一知半解的見識，觀察零碎的事物，它們只知現狀的維護，而忽略變革社會的遠大理想。由於這種缺陷，它們便把計劃經濟解釋成爲平凡的，經常的事實，幾乎從原始社會起就認爲有這種事實的存在。

例如遠古時代俄國的米爾(Мир)及德國的馬克共同體(Markgenossenschaft)制度，根據一定的計劃，共同勞作，公平分配，在耕地外的牧場，森林，河川，湖沼雖不分配，而各份子有平等使用的權利，庸俗社會學者便認爲這就是計劃經濟。其實呢，從型態上看，好像有計劃經濟的意味，但若究其內容，那確是魚目混珠，不能等量齊觀。

爲什麼呢？這至少有兩個理由。第一、因爲施行計劃經濟以後的社會，一定是繁榮康樂的，無論是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達很高的水準。第二、因爲計劃經濟須有遠大的社會理想，以改善人民生活，確保社會生存，發達國民生計，光大羣衆生命爲目的。而這兩大要點，在遠古社會中，都找不出絲毫的蹤影，如何能談得上什麼計劃經濟呢？茲引社會學家甄克斯(Henry Jones)的話，以證明這個結論之不謬。他說：「蠻夷社會，所知而可言者無多。學士爲詩歌文詞，寄意爲天無懷，好言太古之樂，意謂「其時之人，敦龐渾樸，思慮寡少，天宇甚寬，而機械不作，民常老死不相往來，而養生送死之事，無不足者，以視今日社會之勞勞，相去遠矣」——雖然，此特學士意中之境而已，求諸事實，大謬不然。是初民者，世間至苦之生類也。善其靈智既微，則所處，方之禽獸，有不及者。飲食不足以

養，故其軀幹，咸矮弱微小，無偉觀，無衣裳以禦霜雪，無室廬以蔽風雨，形下形上，無所往而非憂疑恐怖之境。雖有親戚，其倫理相繫，與文明之民大殊。今日雖飽，不救明日之饑，幕天席地，居靡定所。死則驚鳥野獸之糞而已。使如是而樂也，則世所謂苦者，又安屬耶？

如若這種社會生活，算是計劃經濟，那末，將來各國採行計劃經濟時，豈不是自尋苦頭，退回歷史上的野蠻時代麼？揆之情理，將來之經濟建設，絕不至於這樣盲目失措。

若以為原始時代有點共同勞作，公平分配的精神，便認為是計劃經濟，亦只有牽強附會的名為「微溫的計劃經濟」，以示與「真正的計劃經濟」迥然不同。因為「真正的計劃經濟」必須包含一切優點的特徵，或者也可以說「總體」的特徵。換言之只有將各部門的經濟生活之優點，使成爲一個整體的關係，才算是「真正的計劃經濟」。

至於游牧時代紀律化的集體經濟，宗法時代帶一點社會主義精神的家族經濟以及封建時代的莊園經濟，雖然有些庸俗的學者加以讚揚欣賞，但是從「總體」上看，也是一樣的夠不上計劃經濟的資格。

計劃經濟在現在論壇上，還是一個意義最含混的名詞。庸俗的學者不但想從原始社會，宗法社會，封建社會尋找它的蹤影，而且也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揚起它的旗幟，爲資本主義制度大聲吶喊，以壯聲勢。

資本主義理論的鼻祖亞丹斯密認爲「個人利己心的自由發展，乃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而使全體社會得到最幸福的狀態」。這就是說，個人按照自己的計劃，自由活動，便很自然的發揮社會的適應性，使全體社會蒙受資本主義的幸福。換言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各個人」所作的經濟活動是很有計劃的，有組織的；這些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活動，因爲利己的關係，自然會發生互相適應的性能，使整個社會得到有意識的發展。例如私人所組織的工廠商店，它的生產、運輸、交易，當然是按照最有利的打算作有計劃的進行，至於工廠與工廠，商店與商店的結合如託拉斯 (Trust) 卡特爾 (Cartel) 等，更具有組織性的，有計劃的，以期達到最大營利的目的。由個人到集團，都

是這樣的孜孜爲利，社會如何能不繁榮呢？

這便是初期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這個理論，表面上好像是冠冕堂皇，而實際上，由資本主義本身的缺陷，是可以把這一套理論推翻的。它的最大缺陷，便是個人經濟的有計劃與整個社會經濟的無計劃所生的矛盾。因爲有了這個大缺陷，有些學者便想許多修正的意見，企求解消這個矛盾以延續它的生命。

如巴茲 (Parsons) 認爲資本主義之下的企業，已經建立了優美的經濟機構，是不應受人誹議的，如若到了相當階段，它有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事實，可以用「科學的經營法」使生產的工廠，交易的市場以及國際經濟的關係，得到適當的管理與調整。這是從「科學的經營法」說明資本主義有走向計劃經濟的程途之可能的。

再如鼎鼎大名的柯爾 (Cole) 從組織方面推測資本主義的前途，似乎更覺得言之有理。他說：「資本主義這種制度如圖存續，它就不能不在國家方面，國際方面，求其更有組織，這實在是顯而易見的事體。世界經濟的將來，無論變成怎樣，我敢斷言，決不會回到舊式的自由放任上面去。假如世界經濟前途，仍是資本主義的，則在今後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各國企業，爲了統制生產與交易，國家與國際方面，將比戰前有更密切的結合，工業進行方面，將與政府保持一種比戰前更密切的關係。……經濟制度無論怎樣變更，世界對於這種必由之路，終無法逃脫。」

這一段話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來資本主義可以由無政府的狀態變爲有組織的狀態，逐漸向計劃的目標前進。

此外，小島精一在他著的「日本計劃經濟論」以及小林一三的「資本主義修正論」都是主張在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以強化社會組織的力量，公平分配經濟上的利益，使無政府的資本主義制度變爲有組織計劃經濟制度。

這些理論，無論說得如何動聽，但總是皮相的，脆弱的，最多只能把「盲目的」或「無稽的」資本主義稍微加以規範，使其不至於像初期那樣的放蕩不羈，易於摧禍，至於說到計劃經濟，那它還差得很遠咧。

這個基本的原因，是由於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的精神不能相容，即資本主義在求個人的利益，計劃經濟在求整個社會的共同福利。因爲資本主義「先天」有了這個弱點，所以無論如何調整它，改善它，而由這個弱點所發生的基

本矛盾——如個人利益與社會福利的衝突，總是難以解決的。至於生產問題與分配問題的矛盾，即個人的生產方面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而社會的分配方面則極端呈現無政府的狀態，更是資本主義致命的打擊。

計劃經濟呢，在先天注定了以共同福利為目的，以生產分配互相調適為手段，所以與資本主義的內容截然不同，另外顯現出來壯美的遠景。

前面已經說過計劃經濟在生產分配兩方面都是很有計劃的，而資本主義只是在個人的生產方面有了計劃，那末若勉強在這種社會施行計劃經濟，只有名之曰「跛行的計劃經濟」，以表示它的形體，有殘缺的病症。

以上是從內容方面，說明計劃經濟有真偽之不同。以下再就形式方面略述其姿態之各異。

前期的計劃經濟為後期的計劃經濟之準備。柯爾云：「每個美滿的計劃經濟，若要滿足其完備的經濟任務，必需顧慮着這一羣花花綠綠的經濟方式與經濟制度之並存與互相交錯的情形」所謂「交錯的經濟」即是指初期而言，所謂「美滿的經濟」即是指後期而言，在計劃經濟的進程上，當然在初期的草創階段，一定呈現錯綜複雜的形勢，一到了後期的成熟階段，便如花技招展似的現出來美滿的風姿了。

美國因為應付一九二九年以來的經濟恐慌，實行了種種緊急設施，如貶低幣值，提高物價，傾銷貨物以及農業救濟案，商業復興法，互惠商約法案，都是復興經濟的重要計劃，於是有人名為這是一「景氣型的計劃經濟」。

與「景氣型的計劃經濟」相關連所謂「國防型的計劃經濟」也是現代經濟進程中一個重要的體制。董問樵先生在國防經濟論一書承認國防經濟為一種計劃經濟，即國防經濟是全民戰爭期中平時和戰時保衛民族之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國防制度。

以上幾種區分都是形式的，但考其內容，除後期的計劃經濟外有許多地方還不合真正的計劃經濟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為有高度的生產力及大規模的組織，只要有變革社會的高尚理想與有效率的行政權力，

便易於推行計劃經濟。至於經濟落後的國家，它必須先着手生產能力，與科學技術的發達，然後才有推行計劃經濟的基礎。例如蘇聯在大革命之後，因為社會秩序的失調生產能力的降低，弄到全國饑荒，農民暴動，以致於不得不改弦更張，實行 *z.s.* 政策。蘇聯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開始改行 *z.s.* 政策時，曾有這幾句自我批評的話：「現在最切要的辦法，在乎擴張生產，而在實際上全國民衆怠惰貧窮，工作缺乏，種種困難，達於極點，使我們不得不犧牲一切而求「生產的增進」使足以分配於民間……」所以計劃經濟的進程必須先認清自己的史地條件及經濟情況，然後才可以開步向前，使社會得到切實的變革。

第二十一節 計劃經濟運行之法則

一、主觀與客觀的適應理論與實踐的合一

二、三大客觀條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與社會結構

三、設計的四大程序

從社會進化的行程看起來，將來計劃經濟的伏流，一定激起各進步的國家，歡欣鼓舞，羣起仿效，蔚為新的風氣。經濟學家桑把特 (Merret Sombart) 在「資本主義之將來」一書中，曾很明顯的說到這個動向。他說：「我們若欲清晰地確定未來的經濟生活之整個精神，必先把它與現在及過去的整個精神對立。現在的特徵是無計劃的束縛與無計劃的制定規則，過去是無計劃的自由與個人專制，將來的特徵只能是有計劃的經濟形成」。

所謂「有計劃的經濟形成」，既不是生產數字的排列，亦不是空中樓閣的幻想，而是主觀與客觀的適應，理論與實踐的合一。下面略述這幾種重要的法則，以供研究。

華格曼 (Ernst Megehnann) 以為「各國民經濟都有其特有的體質，固有的性格及內在的組織。這個，完全從領域之廣狹，發展之遲速，各種不同之自然的，地理的，民族的，心理的，政治的，法律的，技術的，天賦或事實所產生

的」。所以一國經濟的設計至少須從一國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與社會構造三方面着手，方可使主觀客觀適應起來。

第一、從經濟區域來說，一方基羅面積有二百六十四人的英國，或一百三十四人的德國，與十五人的俄國，九人的芬蘭，四人的阿根廷或巴西，當然不能用同樣的計劃經濟，實施於人口密度相差這樣遠的國家之內。

再按同一的經濟區域來說，如英國從西海岸的布里斯托向東海岸的馬西河引劃一線，其南為綠色的英國，其北為黑色的英國，即一為農業區域，一為工業區域，實施計劃經濟時，當然也要顧及這種同一區域上的經濟差別。中國因為幅員的廣大，交通的滯澀，地理的阻隔，以及與外洋接觸的先後遲速，所謂「經濟區域的不平衡」，尤為顯著。如上海已成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城市，華西一帶還充滿封建社會的氣息，蒙古青海還有游牧社會的組織，那末，我們的計劃經濟，更要密切的注意這種差別很大的情況。

第二、從民族性格文化程度及一國的歷史線索來說。桑把特說：「一新興與一疲乏的民族，一積極與一消極的民族，一極文明與一半文明的民族，每一處都要有計劃經濟的個別形成。我們不消詳述俄國與歐洲，中國與日本，印度與英國，巴西與瑞士，德國與法國之間，存着何等的差異了」。

第三、從社會結構來說。計劃經濟必須根據一國的社會結構而定出來不同的類型。如富有宗教色彩的印度與缺乏宗教色彩的中國，對於經濟生活的觀感是很不一致的。如西洋以「個人」為社會結構的核心，中國以「家族」為社會結構的核心，對於資本主義形成的遲速，也是不一樣的。再具體言之，有百分之八十農民的中國，土爾其，保加利亞，與百分之三十農民的德國，百分之八的英國，怎可用同樣的經濟計劃，作硬性的實施呢？

現代世界各地社會的結構有高度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新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之差別，將來要開拓計劃經濟前途，這種差別的認識，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茲引華格曼所述這幾種的差別於後，藉資參證。

主要特徵	高度資本主義	半資本主義	新資本主義	非資本主義
人口密度	密	密	薄	薄

機械使用度	高	低	中	最低
交通	多	少	多	少
工業勞動者比率	高	低	中	最低
國外貿易差額	輸入過超	不定	輸出過超	輸入過超
工業品輸入	中	多	甚多	甚多
工業品輸出	多	少	甚多	甚多
每人所佔的	多	少	多	少
國外貿易額	多	少	多	少

計劃經濟的這三大客觀條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與社會結構，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很簡單的，其實若實行起來，那一定是極其繁雜，非拿出現代的工作效率與強韌的革命精神，絕不易達到最後成功的。

例如蘇聯自大革命以後，直到一九二八年才以完全計劃經濟的觀念，來作實際的實驗，而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它飽嘗了經濟上的災難，經歷了艱險的程途。如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它的鋼鐵生產低於戰前百分之七·五，煤鐵生產低於戰前百分之三五·九，農業生產低於戰前百分之四九，整個國家遂陷於極度恐慌與饑饉狀態之中。蘇聯把握着這種嚴重的局勢，不得不提出「退一步，進兩步」的緊急措施，轉向「*зиг*」的程途前進，奠下了一九二八年以後三個五年計劃經濟的基礎。這個崎嶇的歷史行程，簡單言之，約可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發動社會革命的洪流，破壞舊社會的全部經濟制度。

第二階段（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廢止個人所有權，凡土地，森林，水利，地下富源，地主所有家畜及一切農具，統歸公有，忽然掀起生產上的恐慌，引起農民的變亂。

- 一、民生主義比資本主義完善，比社會主義切實，比共產主義經濟
- 二、民生主義以計劃經濟代替無政府主義的經濟
- 三、民生主義以生產分配的平行主義代替生產的單軌主義
- 四、民生主義以共存共榮的全體主義代替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
- 五、民生主義以和平方式代替強暴方式。

國父認清西洋資本主義的弊害，體會中國客觀環境的需要，遠瞻大同世界的理想，創造了民生主義，以改善人民生活，確保社會生存，發達國民民生計與光大羣衆生命爲目的。從目的上觀察，民生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而完善。民生主義第三講云：『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爲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爲目的』。從意義上觀察，民生主義比一般社會主義更切實明瞭，這有兩大理由，第一、因爲歐美各國對於社會主義的解釋，意見紛歧，互相爭論，還沒有研究出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正確方法，中國如果亦採用社會主義這個名稱，豈不是如墮五里霧中，不知何所適從，所以國父根據中國國情單獨創造民生主義，以免混淆。第二、因爲民生爲政治的中心，經濟的中心，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比用廣泛的社會二字，切實明瞭多了。從方法上觀察，民生主義比共產主義更覺經濟合理。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過：『照馬克斯派的辦法，主張解決社會問題，要平民和生產家專制，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想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貧富不均的大毛病』。足見我們用這種預防的方法，和平的手段，達到大同世界，比較用暴動專制演出種種慘劇的辦法高明多了。

按社會經濟學的研究 政府實施計劃經濟固然需要統制力量，推行統制經濟固然應該按照一定計劃，但是嚴密的辨別起來，計劃經濟等於病前的預防，統制經濟等於病後的治療。一九二八年以來，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病症，

忽然暴發，列強為治療這個急症起見，不得不厲行統制辦法，以挽救經濟的困難。現在中國既非資本主義社會，將來亦不打算實行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恐慌，中國不至於發生的，我們當然用不着頭痛治頭，脚痛治脚的統制經濟，況且我們預先根據國家的情況，人民的需要，規定國營私營的界限，分別先後緩急的步驟，使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達到平衡的健全的發展，根本上把許多疾病都防止了。所以計劃經濟好像講求生理的健康，統制經濟好像忙於疾病的治療。

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既然等於生理的健康，那末，其經濟組織一定要有完整的機構，其生產，分配，消費，一定要有一貫的合理的統籌辦法。資本主義社會則不然，它的組織是以個人和私人團體為單位，各自為政，紊亂不堪，它的生產是以自由競爭為手段，以營利主義為目的，那末它的分配，消費，自然也成紊亂的盲目的狀態了。如此無政府主義的經濟制度，如何能免除社會浪費，經濟恐慌，階級鬥爭呢？我們看到歐美各國已深刻的感受這種苦痛，我們就不能不另外走上一條光明的路線，免蹈前車的覆轍。

前面說過，無政府的狀態，為資本主義的最大特徵，這個特徵的由來是由於發達生產而不同時注重分配。如此發達的結果，少數人抓住黃金似的機會，大發橫財，多數人沉淪到悲慘的境遇，憤恨不平，以至於資本獨佔，生產過剩，平民購買力薄弱，貨物堆積如山，資本家們便想出毀壞貨物暴殄天物的奇怪花樣。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三講說過：『在那些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生產的方法太發達，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問題便不能夠解決。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行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向着一個目標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賺錢』。由此看來我們的民生主義一方面要做到大規模的最高度的生產。同時他方面還要做到全體合理的分配。這生產與分配的平行主義，最後當然取消營利主義，而以適應國家人民的需要為目標。近來還有人主

張先發達生產，將來再解決分配問題，或專注意分配而不提倡生產，都沒有把握着整個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若先發達生產再解決分配問題，無異乎讓一個人狂飲亂食，等到身體發生疾病時，再調節飲食，設法治療。若專注意分配而不提倡生產，好像是在沙漠上建築高樓大廈，豈不是一場幻夢？

國父說過不能以個人的行為反對全體主義。「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亦云：「先生一生努力全在以革命的手段救國救民，打破一切個人主義的迷夢，實現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之實行的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的努力完成國民革命。集中國民革命的勢力，以國家資本主義為建設國民之基礎」。足見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由全民共同努力，經濟建設的利益，由全民共同享受，凡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都為以全民利益為依歸的民生主義所淘汰。十七八世紀個人主義的思想，好像是狂風驟雨似的震動全歐人的心理，霍布斯以「人類最初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說明他的社會理論，盧梭的民約論上第一句話說：「人類是天生自由的，但現在却處處受束縛」。亞當斯密以為人人都有自愛心，自利心，當然知道向前努力改善自己環境，國家何必多事干涉呢？他們提倡的結果，放任主義盛行了，資本主義發達了。可是社會經濟形成畸形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相互如虎狼一般。國父一生的人格和精神，完全以仁愛為基本，看見如此虎狼般的人生與畸形的社會，認定非打破個人主義，決難挽救這種危機，中國非實行民生主義恐亦捲入這個漩渦。這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中有一個很動人的例證：「因為生產的目的是在賺錢，印度每年雖是有饑荒，那般生產的資本家，知道拿糧食來救濟饑民是不能夠賺錢的，要把它運到歐洲各國去發賣，便很可以賺錢。所以那些資本家寧可任本地的饑民餓死，也要把糧食運到歐洲各國去賣。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我們打破資本制度時，雖說容許私人經濟的活動，但是他們的活動，必須受國家的指導監督，有益於公共的福利。

國父在民生主義三講中說到用和平方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意思很多，現在舉出最重要的幾節：「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方可解決之」。『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

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於喫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地權辦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土地問題能夠解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由這幾節話看起來，發展國家資本逐漸的走到大同世界，比較由資本主義社會，經過一陣一陣的革命流血之慘痛再躍到社會主義社會，合理多了。國父爲什麼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最少有三個理由，第一，按哲學解釋，「國父革命的動機，全爲仁愛，離開仁愛，便無革命可言」。以仁慈博愛的精神，解決民生問題，自然要用那最合理的和平辦法。第二、從社會學上解釋，社會的本質應該是合作的，和平的，由合作的和平的方式，才能實現集體幸福的理想。至於社會上什麼紛爭強暴的問題，都是社會的病態，我們能夠用方法防止它的。第三、從中國現狀解釋，中國現在並沒有成爲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採用強暴的社會革命方式，必定生存活剝，損害自己。況且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榨取我們的人力物力，獨佔我們的市場，限制我們的發育，已有百年。我們受了百年來的摧殘，剝削，已經虧損不堪，補救的辦法，最好先慢慢的把精力培養飽滿，再以飽滿的精力，徐圖脫離帝國主義的束縛。否則，本身已十分衰弱，忽然又發動劇烈的社會革命，無異病上加病，促其速死。根據這三大理由，證明民生主義的和平方法不惟有深切的學理，而且適合中國的國情。

最後將上面的意思歸納於後：

- (一) 民生主義仿效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規模組織與最高度的生產力，發展工業農業；但無資本主義的弊害。
- (二) 用政治權力實行計劃經濟，防止貧富不均，免除暴動流血的痛苦。
- (三) 以國家民族的整個力量，建設自立自主的經濟機構，以脫離帝國主義的束縛。
- (四) 採取和平手段，經濟方法，逐漸的限制私有，擴大國有，達到共存共榮的大同社會。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再版

中山文化教育館工業化與社會建設（全一冊）
社會科學叢書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函費另加）



編著者 簡貫三

發行人 姚戟楨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二三一六九）（滬印）



(13169)